

被遺忘的「東征奇將」 ——麻貴與萬曆援朝戰爭諸問題發覆*

徐 成**

摘 要

麻貴作為萬曆援朝戰爭中的最高指揮之一，包含《明史》在內的眾多史籍對其援朝功勳整體卻持否定態度。但若參稽中、朝、日三國史料摒偽存真，卻能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其規劃並參與了包含稷山之戰、兩次蔚山之戰在內的一系列戰役，為戰爭勝利立下汗馬功勞。因其為保全「屬國」、維護東亞秩序和平做出的貢獻，後世朝鮮心懷感念並對其「東遷後裔」進行了優待，然而這種感懷後來卻因各種複雜因素而逐漸消亡，麻貴東征抗日援朝的本末也被漸趨遺忘。這不僅與近代朝鮮民族主義勃興後對明軍選擇性忽視有關，而且複雜的原始史料也給還原其史實帶來無所適從的困難，不同立場者受自身因素影響，選擇建構不同的話語敘述也是其中的深層原因。

關鍵詞：麻貴、萬曆援朝戰爭、稷山之戰、蔚山之戰、跨國史

2022年2月17日收稿，2022年7月13日修訂完成，2022年10月27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壬辰戰爭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譯與研究」(17ZDA223)階段性成果。係陳尚勝師、孫衛國師指導，調查時得吳承山老師提供巨大幫助，並得兩位匿名審稿專家賜誨及編輯部修正。亦曾得楊海英老師、石少穎老師、劉寶全老師、朱洪斌老師、秦麗老師賜教，在蒐集資料、交流心得等方面也蒙張璐瑤、蔡霽安、盧俊丞、李昕洋等賢友協力，謹申謝忱。

** 作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前言

麻貴（1538-1616）是萬曆抗日援朝中最重要的將領之一，他同楊鎬一武一文，統帥明朝、朝鮮聯合大軍，共同策劃並獲得了第二次援朝驅倭當中的一系列勝利，對恢復朝鮮居功至偉，朝鮮方面也承認其功勞實不下於第一次援朝時期的李如松，¹ 是摧破「島夷」、興滅繼絕的關鍵性人物。但就是這樣一位貢獻卓越的將領，以往學術界對其抗日復朝的來龍去脈、事蹟經過卻不甚關注，既有研究也多襲成說，未能全面把握麻貴的入朝參戰情況，遑論深入理解其抗日的具體事蹟及意義。² 其中緣由可能也是多方面的：譬如麻貴本人並無文集和可信的譜牒存世，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之《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49 至 77 冊明代衛選簿之影印本中亦無麻貴所屬的大同右衛資料，僅在當時三國政書、文集、奏議乃至後世所修史書等間接材料中，分散有麻貴的史跡紀錄，故既往關於麻貴的史料，相對稀少且零散。筆者自碩論調查寫作以來，對麻氏家鄉右衛乃至其所宦歷之宣、大諸鎮故地，皆作了親訪，調查閱讀到了一批如《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崇禎元年重修大同右衛城禮拜寺碑記》等珍貴材料，³ 並結合前人相對著眼不多的明人珍稀奏議

1 《朝鮮憲宗實錄》第 48 冊（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憲宗六年三月二十日庚戌條」，頁 473。2005 年 1 月，서울（Seoul）市政府宣布將官方中文名從「漢城」改為「首爾」，為表現歷史事實，筆者所引韓國出版之文獻，出版時間在 2005 年以前者，皆用「漢城：某出版社」，2005 年以後出版者，則使用「首爾：某出版社」。

2 對援朝將領的研究，中文學界亦積累了豐富的成果，篇幅所限，僅舉代表性專著如孫衛國之《「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對石星、楊鎬、李如松等人物之研究，楊海英新作《從〈唐將書帖〉看明清時代的南兵北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對吳惟忠、駱尚志、張應種、吳宗道等南兵、遼兵將領的探討。但關於麻貴在援朝戰爭中的角色問題，既往研究相當匱乏，日韓學界對此鮮少關注，中文學界既有的少量關注麻貴在抗倭援朝中角色的論著，如白壽彝，《回族人物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紀海龍，〈麻貴軍旅行實考析〉，《回族研究》2020.2(2020.6): 47-52 等，也大多不脫《明史》〈麻貴傳〉的窠臼。對麻貴及其參戰經歷與作用，必須通過考鏡三國史料之真偽源流，客觀討論，才能有助於對這場戰爭有一個相對理性的認知。

3 這批珍貴史料之價值及其背後所反映之問題，筆者已另撰專文介紹，未刊稿。

及日方參戰者紀錄、文書與朝鮮史料，加以解讀，並嘗試說明如下的問題：

麻貴運籌帷幄並親身上陣的這場持續數年「再造藩邦」的大戰，究竟是通過怎樣的努力來「恢復屬國」，並由此改變了十七世紀以後的東亞？被塵封的、充滿了後世三國學者爭議的戰爭經過與影響，真相到底為何？如今中日韓三國，鮮少提及麻貴為代表的援朝將士，其形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模糊，他們因何而被遺忘？因此，筆者計劃以麻貴這一人所忽視的抗日援朝核心人物入手，綜合參稽中、朝、日三國一手史料，盡量披沙揀金，取實去偽，對其東征事蹟挖掘考辨，從跨國史的角度綜合體認其意義，並以此為線索，在此基礎上對部分莫衷一是的話題，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見。⁴ 這樣不僅有利於釐清聚訟紛紜的眾多戰史，更有助於把握整個萬曆援朝抗日戰爭的性質，對這場攪動整個東亞三國的「國際性戰爭」，開闢一些新層面的理解。

二、出陣掣肘：麻貴入朝初期的齟齬

麻貴字崇秩，號西泉，⁵ 又號小川，⁶ 大同右衛軍籍，宣府副總兵麻祿

-
- 4 麻貴本人雖然鮮少被注意，但其策劃參與過的稷山之戰、兩次蔚山之戰都是極為重要的戰事，針對它們本身的戰史情況，三國學者各執一詞，歧見頻出，甚至各有各話，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專著專書如中國學者李光濤，《朝鮮王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劉寶全，《王辰倭亂時期朝明關係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劉子敏、苗威，《明代抗倭援朝戰爭》（香港：亞洲出版社，2006）；羅麗馨，《十九世紀前的日韓關係與相互認識》（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20）；（日）北島萬次，《豐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日）中野等，《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韓）李炯錫，《王辰戰亂史》（漢城：新現實社，1974）；（韓）徐仁漢，《王辰倭亂史》（漢城：韓國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1987）；（韓）李啟煌，《文祿・慶長の役と東アジア》（京都：臨川書店，1997）；（美）Kenneth M. Swope,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 1592-1598*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9); 等等都有涉及，專文更是不少。
- 5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朔州：右玉縣殺虎口博物館藏碑）。
- 6 （韓）申欽，《象村稿》（《韓國文集叢刊》第72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卷39〈天朝詔使將臣先後去來姓名，記自壬辰至庚子〉，頁285。

之幼子，宣府總兵麻錦之弟。⁷ 早年本無世職，在庚戌之變中與父兄參與大同右衛保衛戰，得由舍人歷陞指揮使，起家赤城守備，旋改新開口（東馬營）守備。⁸ 隆慶元年（1567）陞署都指揮僉事，充宣府入衛游擊。⁹ 不久，代父擔任第二任新平堡參將，¹⁰ 後改宣府北路參將，陞宣府副總兵，改大同副總兵，回家鄉本鎮駐防。因在任時邊防寧謐，蒙古部落「交壁款關，帖然無嘩」，兵部議論推陞寧夏總兵，未果，¹¹ 神宗詔改貴以署都督僉事充大同總兵。¹² 在任九載，兩次參與對蒙封貢，且「振飭兵戎，繕葺圍壘」，頗著勞績，惜因「虛冒營馬」等事被閱視少卿曾乾亨彈劾，罷職謫戍。¹³ 萬曆二十年（1592）寧夏哱拜等人起兵叛亂，麻貴被起用，以戴罪之身管副總兵事，帶長子承詔及家丁健兒西征寧夏，初戰即「遏截哱拜，使之內外不通」，又以血戰海寶塔、張亮堡、小鹽池、沙拜、小沙井諸處有功，被監軍梅國楨題奏復官。¹⁴ 次年（1593）推陞延綏總兵，¹⁵ 在任期間於常樂堡、神木、下馬關、寧塞等處屢獲戰勝，兩蔭其子，¹⁶ 總督葉夢熊稱延

7 明·佚名，《大明特進榮祿大夫都督□□□□□□松山麻公墓誌銘》（朔州：右玉縣殺虎口博物館藏碑）。抄件又見牛建山，〈殺虎口旅遊區博物館碑廊碑文辨析〉，《右玉文史資料》第 23 輯（朔州：右玉縣政協辦公室文史資料委員會，2015），頁 37。

8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9 《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3「隆慶元年正月丙子」條，頁 77。

10 《明穆宗實錄》，卷 19「隆慶二年四月丙戌」條，頁 525。

11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12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134「萬曆十一年閏二月甲子」條，頁 2497。

13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明神宗實錄》，卷 240「萬曆十九年九月丁丑」條，頁 4466；《明神宗實錄》，卷 240「萬曆十九年九月乙酉」條，頁 4474。

14 明·梅國楨，《西征集》（東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刻本），卷 2〈第十二疏·為仰仗天威蕩平大亂，直據所見查敘有功文武大小諸臣，以候聖裁，以定恩賞事〉，葉 18a；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15 《明神宗實錄》，卷 259「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丁未」條，頁 4813。

16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綏屢捷，貴「功尤最」。¹⁷不久因病回故鄉調理休養。¹⁸總之，貴在西北「身經百戰，氣奪千人」、「破虜制敵，威名獨高」，已然有老成宿將的聲名，¹⁹麻氏家族也成為明軍邊將中與鐵嶺李氏並稱「東李西麻」的將門。²⁰

而當明、日和談破裂，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初，日軍再次侵朝，朝鮮又一次請援時，明廷決定再次援朝抗日，因李如松剛剛被神宗中旨特用為遼東總兵，「東虜」事急，無法抽身，神宗便揀選同樣是百戰名將的麻貴為備倭總兵，²¹三月，貴以欽差提督南北官兵禦倭總兵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身分渡江入朝。²²麻貴是第二次援朝戰爭裡僅次於總督邢玠、經略楊鎬兩名文官的武官總指揮之一，也是明廷派駐援朝的最高級別武將之一。²³五月，麻貴遣家丁麻寵報知邢玠，計劃「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以達到擒行長而驅清正的目的，獲得了邢玠認可。²⁴五月初四，麻貴率七千馬兵從廣寧出發，先到遼東都司駐地，十六日從遼東起身開始渡過鴨綠江，二十二日過江。²⁵七月，麻貴行軍至碧蹄館，此前計劃調發的宣大兵馬一部分也陸續來到，²⁶不久麻貴「領大兵」屯駐王京漢城，日夜巡城固

17 《明神宗實錄》，卷 282「萬曆二十三年二月戊辰」條，頁 5224。

18 同上註，卷 294「萬曆二十四年二月甲寅」條，頁 5468。

19 明·王鳴鶴，《登壇必究》（《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第 3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40〈兵部議覆寧夏功賞疏〉，頁 589-595。

20 明·荅上愚公（茅瑞徵），《東夷考略》（臺北：正中書局，1981），頁 174-175。

21 《明神宗實錄》，卷 307「萬曆二十五年二月丙子」條，頁 5742。

22 （韓）申欽，《象村稿》，卷 39〈天朝詔使將臣先後去來姓名，記自壬辰至庚子〉，頁 285。

23 丁酉倭亂起，最開始只派去麻貴一人為備倭總兵，乃派駐朝鮮唯一最高武將，後來陸續派去劉綎、董一元、陳璘等人，四人都加了提督名色，各管南北官兵、漢土官兵、總督標下參贊、水兵，在四路作戰時各管東路、西路、中路、水路。貴正式職銜為欽差提督南北官兵禦倭總兵官。

24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禦倭史料匯編》第 4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卷 2〈申明進止機宜疏〉，頁 26。

25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宣祖三十年五月十八日戊申」條，頁 225；《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戊午」條，頁 233。

26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2〈申明進止機宜疏〉，頁 28。

守，但面對日軍進逼，此時的宣祖君臣又萌生逃意。²⁷麻貴在駐防漢城時發現該城雖是朝鮮都城，但外城殘破不修，根本無法防禦進攻，麻貴向朝鮮建議修築子城、繕理牆垣，但他「數次講說」，宣祖君臣卻「多方推阻」，毫不配合，麻貴只好親率諸將日夜忙碌，興工修繕，在此過程中還遭受到了朝方的反對，朝方堅稱外城原本殘破難守、不如走為上策，百般畏葸推諉，被麻貴再三勸導。²⁸朝方的推阻不僅是出於國力凋殘，某種程度上也出於在初期對麻貴的不信任，而這一不信任與朝方所獲得的情報密切相關。

一開始朝鮮方面便時刻關注著禦倭總兵人選的問題，早在神宗剛發布對麻貴的任命之後四天，朝鮮奏聞使鄭期遠便在遼東七家嶺從序班許洪先那裡知道了這一消息，並及時傳回宣祖處。²⁹不僅如此，朝鮮君臣還十分留意麻貴等人入朝的情況，並多方推測其未來可能的動向，宣祖李昖親自問諸大臣：「麻貴及他諸將，一時出來，可即剿賊耶？若不然而持久，則何以支吾？」言語中迫切希望麻貴迅速進攻，李恒福從明朝咨文中有「無輕浪戰」之語推測麻貴等人可能要打持久戰，而柳成龍則認為「以天兵為聲勢，以我兵舉事可矣，勢不可以持久」，諸臣心生旁猜，頗懷疑慮，宣祖得出結論，認為「中原咨文有輕戰之戒，若不熟講而戰，則恐有後患」。³⁰加之此前明朝發來的咨文中反復強調朝方務必等待麻貴渡江，嚴禁輕舉妄動，毋妄自與日軍衝突，³¹朝鮮方面內心疑竇叢生。尹斗壽甚至向宣祖提議，朝方應該向明朝匯報無糧可供給麻貴軍馬。在這一節骨眼上，明軍遼東副總兵楊元又對來訪的李恒福、柳成龍等人說麻貴帶了一千名「韃子」，以「韃將」領之，必然擾害地方。³²雖然宣祖認為楊元可能是在恐嚇朝方大臣，但此時宣祖君臣在具體戰略上對麻貴為代表的明軍將士確實產生了一些疑問和惶惑。

儘管帶有質疑和猜忌，對麻貴的工作採取軟性的拒絕配合，朝鮮君臣

27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八月十五日癸酉」條，頁 281。

28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2〈直陳朝鮮情形疏〉，頁 146-147。

29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乙卯」條，頁 184。

30 同上註，「宣祖三十年五月十五日乙巳」條，頁 222。

31 同上註，「宣祖三十年四月十八日戊寅」條，頁 202。

32 同上註，「宣祖三十年五月十五日乙巳」條，頁 223-223。

卻並不敢在外在形式上將齟齬盡情表現，而是做好禮節，並觀望麻貴的態度，免得朝廷責怪藩邦。因為麻貴畢竟是明軍的高級武官統帥，是奉天子命而來。宣祖親自下令：「觀麻都督皇敕，責任極為非輕。麻也實膺推轂之任，而六師之帥也。入京之日雖出門外迎慰，此則乃待客之私禮也。天子之命新至，而本國君臣小無禮節，無乃不可乎？其日都督至沙峴近處，自上出立於道右，與百官拱立以迎，此乃所以敬皇命也，非敬麻公也。如是則天朝聞之，未必不以為是，無乃如是為之可乎？」³³ 並且，宣祖在漢城慕華館接見麻貴時舉動皆合體貌，麻貴來時宣祖親自「降階迎揖，揖讓而陞，乃就座行茶禮，又行酒禮」，席間自責道「寡人守藩失職，猝被寇禍，至於再勞王師，不勝惶恐」，麻貴也是老成官員，寒暄道「國王出郊遠勞，日氣甚熱，請入休」，賓主行二爵酒而止。³⁴ 雙方觥籌之間，看似和諧謙讓，朝方的實際行動卻並未如酒宴間表現的那樣輔車相依。

事實上，宣祖君臣如此消極抗拒，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對明軍決策層的規劃發生了誤解。但之所以明軍未迅速展開進攻，是因為邢玠、麻貴等明軍高層指揮認為暫時「不知就中情形」，敵情不明，³⁵ 因此邢玠命麻貴將已到軍兵調集，在王京一線「就近聯絡，犄角分防漢江南北」，「相險設伏」。³⁶ 而且明軍兵馬尚未全部召集完成，直到萬曆二十五年夏天，真正到達朝鮮境內的明軍尚不足兩萬，邢玠一直在催調遼鎮在內的各鎮兵馬；³⁷ 糧餉方面朝鮮供應不濟，明朝官府徵發的糧食還沒運到，兵士缺糧稍餉，根基不穩。³⁸ 在人馬、糧餉全都不足的情況下，倉促開戰只會資敵以可乘之機，這是邢玠、麻貴等人出於綜合考慮敵情與自身狀況的謹慎考慮。朝方對明軍迅速開戰的急切盼望，與明軍先探敵情、做好準備再料敵用兵的戰略考量發生矛盾，是朝鮮對麻貴為代表的明軍將士產生猜疑的根本原因。

33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六月三十日己丑」條，頁 259。

34 同上註，「宣祖三十年七月三日壬辰條」，頁 260。

35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2〈申明進止機宜疏〉，頁 34。

36 同上註，卷 2〈直陳朝鮮情形疏〉，頁 156。

37 同上註，卷 2〈調協守李如梅疏〉，頁 126。

38 同上註，卷 2〈催發水陸官兵本折糧餉疏〉，頁 107。

如果再從朝鮮供餉消極的現象進一步思考，一個更加深層的因素或許是，朝鮮一方面全力切斷明日和談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務求令明軍在朝鮮速戰速決班師、以免長久駐紮，這也許可以解釋朝方的不作為。朝鮮對於明朝，滿口天朝、天兵，自稱小邦、藩屬，實則對於自己與明朝的區別，有極為強烈的堅持，危機感和「自我身分認同」都相當突出。在明軍援朝一事上，朝方對自身利益的斟酌考量是遠大於明朝的；³⁹ 而明朝為了維護這一以中原王朝為核心、諸國為環屏的宗藩體系，存祀「字小」，伐暴除殘，興滅繼絕，保障遼東邊疆及朝鮮安全，加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資訊封閉和天朝虛榮的雙重影響，最終「吾皇按劍赫威怒，獨運神謨懲往誤」，⁴⁰ 參與了這場持續多年的東亞大戰。

三、開門之捷：稷山之戰及其意義

萬曆二十五年春，明廷依朝方建議，先在南原、全州等地部署軍力，欲將日軍鉗制在慶尙道東南，以防禦為主，待軍力大集，再一舉殲滅強寇，惜未遂人算，朝鮮水師敗績、統帥元均陣亡，陸上南原遂遭失陷，日軍水陸並進、迫近王京漢城，明朝援軍決策層在這種情況下及時調整了禦倭方針，開始在王京一帶集中兵力，變被動防守為主動出擊和伏擊。⁴¹ 為保王京安全，經略楊鎬連夜馳往漢城，召集麻貴等人設謀布陣，計劃設伏於稷山，給日軍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

先是，賊自陷南原，乘勝長驅，進逼京畿。經理楊鎬在平壤聞之，馳入京城，招提督責不戰之狀，與提督定計，密選騎士之精勇者，使解

39 加拿大韓裔學者許南麟（Nam-lin Hur）曾提出朝鮮誘使明朝為朝鮮打「代理人戰爭」這個有趣的觀點，值得參考。見（加）許南麟（Nam-lin Hur）著，宋宇航譯，〈丁酉再亂時期豐臣秀吉的撤退嘗試與戰爭的終結〉，《新亞學報》34(2017.8): 309。

40 明·于慎行，《穀城山館詩集》（《明別集叢刊》第4輯第4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卷5〈平倭奏捷歌〉，頁69。

41 陳尚勝，〈論丁酉戰爭爆發後的明軍戰略與南原之戰〉，《安徽史學》2017.6(2017.12): 26-37。

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領之，迎擊於稷山，諸軍及我人皆莫知也。⁴²

九月五日宣祖接見麻貴時，實際上麻貴透露了計畫的一部分，即讓朝鮮兵穿上明軍衣服作疑兵，並招集閑山餘船，令李舜臣「於江華等處與天兵合力相機進退」，但宣祖以忠清、全羅地方會缺乏防軍，且地方殘破難以措辦唐服等理由推阻，麻貴只能請求宣祖讓朝鮮兵戴頭巾穿號衣假裝成浙兵，並希望李舜臣多聚船只「以為天兵之聲勢」，⁴³但亦無下文。應該說此時朝方官方不僅在糧餉供應、城池修理上有所遲緩，軍事配合上亦有些表現不佳。⁴⁴

楊鎬、麻貴等人佈劃初定後，九月初六日，明軍探得日軍已經到全義館，⁴⁵九月初七日，日軍先鋒部隊自天安往稷山愈加逼近，麻貴部下驍將解生、楊登山、頗貴、牛伯英四將領精銳者二千名、將官十五員，與日軍「逆戰於稷山十五里許」，⁴⁶大戰開始前，日軍先鋒部隊都穿著白衣服「遍野而來」，因朝鮮民族喜穿白衣，明軍開始以為是朝鮮人，所以「不為進逼」。結果日軍突然先放炮，明軍「一時跑馬廝殺，交戰良久」，奮勇作戰，「中箭、被棍死」的日軍「幾至五六百」，⁴⁷明軍一共斬首三十一級，死傷者不可勝數。解生手斬二級，楊登山斬一級，頗貴斬三級，馬匹、器械之

42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第 25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一日朔己丑」條，頁 663。

43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五日壬辰」條，頁 288。

44 陳尚勝、洪性鳩、楊海英諸先生皆對朝鮮在糧草上的不濟作出探討：陳尚勝，〈壬辰禦倭戰爭初期糧草問題初探〉，《社會科學輯刊》2012.4(2012.8): 174-182；（韓）洪性鳩，〈丁酉再亂時期明朝的糧餉海運〉，《新亞學報》34(2017.8): 259-284；楊海英，〈明代萬曆援朝戰爭及後續的海運和海路〉，《歷史檔案》2020.1(2020.2): 52-61。陳文指出朝鮮政治腐敗及行政效率低下，未能及時供應糧草予入朝作戰的明軍。洪文也指出，在戰爭第一階段，朝鮮方面並未積極配合海運方案之實施，結果是議而不行；第二階段，朝鮮官員權位甚至建議明朝不應實行海運而應「先發遼左之穀」，明朝官員張養蒙提交了詳盡的海運方案，但究竟有否實施，未見洪性鳩進一步說明。又據楊文，第一階段明軍海運船隻進入朝鮮，往往被朝鮮人搶劫，見該文頁 55。

45 明·徐希震，《東征記》（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萬曆三十二年〔1604〕刻本），葉 11b。

46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九日丙申」條，頁 291。

47 此據九月九日麻貴的接伴使張雲翼啟報所轉述明軍士兵的說法，載《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九日丙申」條，頁 290。

所被獲者，未及計數。⁴⁸而「倭賊登山舉白旗，天安大軍即刻雲集，眾寡不敵，各自退守」，解生、楊登山、頗貴、牛伯英等人七日之夜「發稷山前來」、「回軍過振威，初昏到水原，飯後便即起馬，夜才二更矣」，麻貴又「即刻發放各營，使之盡數出陣江邊仍為野營，且發令旗」，並命令擺賽領兩千五百名精兵迎擊日寇於水原之路。⁴⁹儘管最後明軍因為毛利秀元（毛利輝元養子）帶著三萬日軍前來援救而撤退，⁵⁰稷山之戰仍然可以說是一場精彩的遭遇戰，一定程度上為明軍、朝鮮軍以提氣，且給予了日本侵略軍教訓，扭轉了南原失陷帶來的士氣沮喪。

根據日文史籍記載，對陣解生諸將的這股日軍先鋒是黑田長政部下黑田圖書助（直之）和栗山四郎右衛門（利安），⁵¹還有後藤又兵衛（基次）。⁵²解生在「西山之高處」作戰，前二三里處四方都布滿了明軍，⁵³黑田長政

48 此據九月九日申忠一的啟報，載《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九日丙申」條，頁 291。張雲翼啟報明軍共「斬級三十餘顆」，解生、楊登山（《宣祖實錄》此處誤寫作「楊參政」，應為「楊參將」）「各手斬二級」，張的啟報戰績不如申忠一報的詳細，在此處斬級數目上，本文傾向於申忠一；在日軍「死傷者」數目上，申忠一模糊而張雲翼詳細，申氏啟言「死傷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之所被獲者，未及計數而來云」，張氏啟言「中箭、被棍死者幾至五六百」，本文在此處取張說。另外《域外長城》一書中誤把「解副總楊參政（將）各手斬二級」解讀成了楊鎬親自斬殺兩個日軍首級，見楊海英，《域外長城——萬曆援朝抗倭義烏兵考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86。對比申忠一和張雲翼的奏報可知斬級的是楊參將（登山）而非楊參政（鎬），當時楊鎬不在稷山而在漢城，到九月十一日才南下水原，參考《朝鮮宣祖實錄》23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十一日戊戌」條，頁 292。而且假設「楊參政」沒寫錯，論官職排名「解副總」也幾乎不太可能排到作為總管經理朝鮮軍務的「楊參政」前面。楊著此處白璧微瑕，謹稍作商榷。

49 《朝鮮宣祖實錄》23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九日丙申」條，頁 290-291。

50 （日）貝原好古，《菅氏世譜》（《史籍集覽》第 15 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頁 472。

51 （日）貝原益軒，《黑田家譜》（福岡：福岡縣立圖書館竹田文庫藏江戶時代寫本），葉 29b-30a。

52 （日）林羅山，《豐臣秀吉譜》下冊（名古屋：愛知縣圖書館藏明曆四年〔1658〕刻本），葉 45b。

53 （日）貝原益軒，《黑田家譜》，葉 30a。

見解生等明將與栗山等人混戰，「東擊西突，左旋右轉」，於是「自督兩千兵而進擊」，毛利秀元援軍亦到，解生、頗貴、牛伯英等人「辟易而逃」，⁵⁴之後這成了黑田長政的大功，日方聲稱在稷山戰鬥中「大明人敗北」。⁵⁵但是，解生等人的這場戰鬥本來就是一股「奇兵」，用的就是楊鎬麻貴定下的「奇計」，奇兵本來就是用來作「伏奇兵以爭利」⁵⁶的奇襲之用，並非要和大規模軍隊正面相撞。早在戰爭開始前的九月初五，解生就秘密吩咐部下：「今看賊勢，明當決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軍律。但彼賊狡黠，倘至敗退，必由山路而去，險阻之地，騎步異勢，不可窮追。」⁵⁷奇兵達到伏襲的作用後自然是要撤退，所以趁毛利秀元大軍來援之前撤走是意料之內的行為，部分日方史籍針對解生等人撤退的記述，僅僅是對表象的一種描寫，殊不知明軍奇襲完成後本就是打算旋師而還，所謂的「敗北」而走本來就在明軍原有計劃內。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儘管是同一場戰爭，若不綜合中、朝、日多方的看法，僅據一方史料，就只能看到此事的一個側面，無法知道全貌如何。

解生率軍北撤後，走到稷山、振威之間的素沙坪時，日軍大兵追趕，生等人「伏兵於稷山之素沙坪，乘賊未及成列，縱突騎擊之，賊披靡而走，死者甚多」，⁵⁸一部分日軍故技重施，偽裝成朝鮮人，被頗貴斬殺。⁵⁹明軍又於素沙坪之弘（洪）慶院暗埋火藥於草料中，日軍中計，被火死傷甚夥。雙方力戰，日軍敗遁，向木川、清州而走，此役即為後世號稱「朝

54 （日）林羅山，《豐臣秀吉譜》下冊，葉 46a。

55 古文書日語原文：「大明人稷山相拘在之付而、……、則其方先手衆取合追崩、……大明人都のことく令敗北由、……。」，見《黑田家文書》第 1 卷「本編」，第 108 號（福岡：福岡市博物館，1999）。轉引自（日）津野倫明，〈黑田長政宛鼻請取狀について〉，《高知大學人文學部人間文化學科・人文科學研究》2011.17(2011.7): 1-21。

56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99〈劉敬傳〉，頁 2718。

57 （韓）趙慶男，《亂中雜錄》（《大東野乘》第 28 卷，漢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0），葉 32a。

58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第 25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朔己丑」條，頁 663。

59 （韓）吳希文，《瑣尾錄》（《壬辰倭亂史料叢書·歷史》第 6 冊，晉州：國立晉州博物館，2002），卷 6〈丁酉日錄·九月後·九月十五日〉，頁 230。

鮮三大戰」之一的素沙坪（又名金烏坪）之捷也，⁶⁰ 這給朝鮮後世文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直到朝鮮王朝後期，朝鮮士人仍有「畿湖兩界水頭分，撥路倭橋正夕曛。牛馬長過洪慶碣，烏鴉猶似解生軍」、⁶¹「行人立馬素沙坪，忽憶麻公善用兵。驕虜投鞭將北渡，將軍授鉞向南征」⁶² 的吊懷。

稷山奇擊戰後，麻貴擔憂日軍「聞牌傳水陸攻搗，其志漸隳，且（倭兵）兩戰失利，疑我益兵，今既拔寨遽歸，行無紀律，急迫恐墮其計」，所以計劃好等日兵退至中途，「令輕騎躡後擊之」，⁶³ 遂派遣彭友德、柴登科、擺賽追擊毛利秀元部日軍於錦江之邊，九月十七日斬四十六級，日軍逃過荊江，⁶⁴ 明軍又追至荊江，接戰連捷：柴登科軍得十四級；擺賽手斬四級，軍丁獲三十六級；彭友德軍丁得三十六級；麻貴帳下家丁斬三十五級，其他將官帳下軍丁亦有所獲，合諸營一百五十五級。日軍紛紛往清州、公州兩處大陣奔還，「或入湖南，或從烏嶺，四散而退」，逃散途中日軍對朝鮮百姓進行了殘酷的屠殺，「道路村墟，積屍如山，孩提不遺」。⁶⁵ 日軍已然呈現受挫而遁、氣急敗壞之形。此戰以後，日軍便由主動進攻轉為被動防守，多數龜縮倭城，明、日兩軍攻守易位，日軍這種頹勢一直持續到逃離朝鮮。⁶⁶

稷山、素沙、荊江、錦江這一系列行雲流水般的戰略進擊，不僅使日軍落荒而逃，挫敗了其原本浩大的聲勢，暫緩了其看似披靡的進攻腳步。而且保住了漢城，增強了宣祖君臣的信心。在稷山大捷以前，宣祖國王已經計劃播遷外地，王親家眷預先也已送到了黃海道海州。⁶⁷ 在稷山之戰發生的同時，楊鎬、麻貴一方面早已提前做好派解生等人奇襲日軍的規畫，成竹已具；另一方面楊、麻二人又親自力勸宣祖出行巡視漢江，以鼓勵漢城士

60 （韓）趙慶男，《亂中雜錄》云：「稱朝鮮三大戰，平壤、幸州、金烏坪云。」（葉 32a）。

61 （韓）姜浚欽，《素沙》，《三溟詩集》第 7 編（《韓國文集叢刊續》第 110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10），頁 294。

62 （韓）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95 冊），卷 1〈素沙〉，頁 55。

63 明·徐希震，《東征記》，葉 12b-13a。

64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十八日乙巳」條，頁 297。

65 同上註，第 25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二十日丁未」條，頁 298。

66 孫衛國，《「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頁 164。

67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2〈直陳朝鮮情形疏〉，頁 147。

民的民心士氣，結果捷報一傳來，「京中乃稍定」，漢城人心得安。⁶⁸ 如果宣祖提前逃走，都城裡的朝鮮官民必因失去主心骨而星散四方，這十分不利於整體的抗戰局勢。明朝、朝鮮總軍力此時尚不足以直接硬性攻打日軍，若在此關頭君臣軍民一齊流亡，剩下的漢城駐軍勢單力孤，甚至將重蹈第一次日軍入侵時期漢城陷落的覆轍。從這一角度而言，稷山之戰意義非凡。

稷山之戰不僅保全了朝鮮首都漢城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城市，大壯明朝、朝鮮文武軍民聲氣，而且真正讓朝鮮君臣相信了麻貴等人的能力與抗日的決心。麻貴之力主平倭，也可從當時援朝戰爭親歷者、朝鮮文臣申欽的回憶裡體現：在「丁酉再亂」中，日軍曾通書於各衙門，麻貴不肯拆信，收完輒焚之曰：「朝廷欲令講和，則一能言之士足矣。何用我輩領十萬軍來耶！」⁶⁹ 這種氣節令後來正祖時期的著名文臣黃景源（1709-1787）贊歎不已，作詩〈麻大將軍出塞歌〉稱頌曰：

是時諸將議和好，蠻書紛紛乞修聘。獨公毅然不發封，東向瞋目罵清正。曰：「余志在明大義，惟懼不能斬梟獍。天子授余大將軍，非為兩國盟約請。」帳前乃焚講和書，三軍鼓舞與相慶。⁷⁰

景源雖是利用文人的想像之筆戲劇化地描寫了麻貴當時的斥和場面，痛快淋漓。但其文學想像淵源有自，不是向壁虛構。麻貴在東援以前，就以對日強硬的態度而被傾向防倭備戰的朝鮮經略孫鑛選中，⁷¹ 建議調來防倭，孫、麻二人「同心主戰」，意氣相投，⁷² 也就是說麻貴的「禦倭」之志早

68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第 25 冊，「宣祖三十年九月朔己丑」條，頁 663。

69 （韓）申欽，《象村稿》，卷 39〈天朝詔使將臣先後去來姓名，記自壬辰至庚子〉，頁 285。

70 （韓）黃景源，《江漢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24 冊），卷 2〈麻大將軍出塞歌〉，頁 43。

71 日軍第一次侵朝後，雖然兵部尚書石星主張和議，但孫鑛對冊封日本一事整體持懷疑與審慎的態度，基本持防倭的意見，提倡對日本做好提前再次開戰的預備，從他與當時內閣諸臣如沈一貫通信中頗能看出這一點，參明·孫鑛著，孫如洵輯，孫元杏、孫光烈校，《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嘉慶靜遠軒重刻本），卷 5〈薊遼兵筭〉，葉 20b-24a。

72 明·趙南星，《趙忠毅公詩文集》（《明別集叢刊》第 4 輯第 28 冊，合肥：黃山書社影印，2015），卷 10〈麻大將軍平倭序〉，頁 283-285。

已蘊乎胸臆。儘管在入朝初期因為朝鮮方面的誤解和懷疑，麻貴的駐防、戰鬥工作遭到了一定的阻力，但稷山之捷證明了包含麻貴在內的明軍高層指揮官的必勝決心與抗戰能力，也使得朝方此前內心的疑慮有所渙釋，為明朝朝鮮聯軍在以後戰爭中的配合，一定程度地降低了阻礙。

四、勝負為何？——第一次蔚山之戰功罪再論

第一次蔚山之戰是麻貴、楊鎬等人策劃、指揮並親自參與的一場大規模戰鬥。但這場戰爭從發生之後到如今，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是聚訟紛紜的話題，在當時牽涉著朝堂政爭，在如今則影響著學界對這場戰爭乃至整個明軍援朝事實的認識。誠如前人所言，中朝史料說法差異最大的就是蔚山之戰，《明史》等中國史籍謂之大敗，麻貴、楊鎬皆有罪責；朝鮮史料則稱其獲勝，實為楊、麻之功。⁷³ 本文想進一步說明的是，不僅中朝史料差異巨大，中、朝、日三國史料對這場戰爭也是互有歧異，這也帶來了三國學者針對此戰的戰爭部署、戰史過程、傷亡損耗、後世影響的研究上莫衷一是。⁷⁴ 對其真相的探求，對理解以麻貴為代表的明軍將士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及因此產生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在本部分，筆者嘗試在綜合研讀三國史料的基礎上，努力辨其訛誤，釐其史實，並就一直以來爭議不斷的明軍功罪問題，闡述自己的一家之言，供學界批評參考。

萬曆二十五年底，在朝鮮境內的明軍已經有四萬兩千多人，對日軍發起主動進攻的條件已經成熟，十二月初四，邢玠、楊鎬、麻貴共同商量

73 孫衛國，〈中朝視野下兩個形象迥異的楊鎬〉，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古代社會高層論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606-620。

74 從原始史料上，明朝、朝鮮、日本等一手奏疏、文書、日記等就已經對戰爭過程、勝負、參戰人數、傷亡情況產生了差異巨大的說法，各國學者再由此出發，各偏重己方材料，產生了數量巨大的言人人殊、各執一詞的文本，使研究者無所適從，而這些文本之間的比勘取捨，目前學界所作工作還有不少可突破的空間，本節正文部分會詳細引例分析。

「發兵搗蔚山」之事，⁷⁵之後祭告天地，犒賞三軍，兵分數路，預備南下，⁷⁶此第二次援朝中明軍第一次大規模戰略進攻。明軍四萬多兵馬被劃為三協：左協主將李如梅，計劃由忠州進攻清正，⁷⁷統領「馬步一萬二千六人」，下轄盧得功等人；⁷⁸中協主將乃高策，計劃由忠州進攻行長，⁷⁹統領「馬步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人」，下轄祖承訓、吳惟忠、頗貴等人；⁸⁰右協主將李芳春、解生，專阻全羅一帶救援，⁸¹統領「馬步官兵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人」，下轄牛伯英等人；擺賽、楊登山、張維城等人「臨期聽調」，邢玠又令麻貴、楊鎬管轄左右兩協兵，計劃直趨慶州攻打蔚山，中協兵馬負責救援左右二協，⁸²布置十分周詳。十二月二十日楊鎬、麻貴都到了慶州，哨探得知清正屯聚於蔚山，由此謀籌了下一步埋伏圍堵的計畫。⁸³

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⁸⁴（日本史籍記為二十二日，這是因為當時明朝朝鮮和日本所用曆法不同產生的差別）丑時初（凌晨一點多），

75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4〈島山撤兵疏〉，頁195。

76 明·諸葛元聲，〈日本下〉，《兩朝平壤錄》，收入北京大學朝鮮文化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頁152。

77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6〈獻俘疏〉，頁208。

78 明·諸葛元聲，〈日本下〉，《兩朝平壤錄》，頁144。

79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6〈獻俘疏〉，頁208。

80 明·諸葛元聲，〈日本下〉，《兩朝平壤錄》，頁144-146。

81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6〈獻俘疏〉，頁208。

82 明·諸葛元聲，〈日本下〉，《兩朝平壤錄》，頁144-146。

83 同上註，頁152。

84 明曆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和曆（準確來說是在日本施行的唐《宣明曆》）為十二月二十二日。參（日）參謀本部編纂，《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偕行社，1924），頁378。對比閱讀三國史料會發現日軍記載日期與明朝和朝鮮史籍記載有一天的差別，這是因為在十六世紀末期日本使用的是唐朝《宣明曆》，而明朝和朝鮮使用的是明初在《授時曆》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大統曆》，有明一代《大統曆》其實因其有誤差而屢興議論。讀者如有興趣比對兩種曆法差別，可參讀《宣明曆》、《授時曆立成》、《大統曆法通軌》等書進行研究，皆收入石雲里，《海外珍稀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集成》（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0）。本文不註明者均用明朝朝鮮用的紀日，日本文獻裡的和曆紀日，筆者會標明「和曆」二字。

明軍自慶州分三路向蔚山進軍。⁸⁵ 親歷這場戰爭的日軍將領大河內秀元記錄道：「十二月廿二日（按明曆二十三日）寅の刻終」（凌晨五點），日軍「一炊の夢未覺」（尚在睡夢），明朝大軍就鋪天蓋地殺來了，⁸⁶ 麻貴部將擺賽帶領的左協先鋒部隊直搗蔚山日軍營地，「佯北誘引」，再次大戰，斬首五百餘級。⁸⁷ 麻貴親督前軍，下令退後即斬，楊鎬親督中軍催迫攻鬥，煙氣漫天，炮聲如雷，⁸⁸ 聯軍「多發震天霹靂炮，外城蹂躪殆盡」，⁸⁹ 此陣生擒日軍將官一名，通過盤問此人明軍得知了清正之前在西生浦的情報。解生、李芳春由西路來掩殺日軍，⁹⁰ 明軍又將「城外賊幕盡為焚燒」，剩下的日軍逃入城內土窟。日晡（下午三點至五點），南兵尚未到齊，於是明軍解圍休兵，計劃第二天再作進攻。楊鎬和麻貴在日軍營地一座馬場外點數戰績，看驗首級、牛馬、器械，朝鮮方面的張雲翼、權慄、李德馨陪同查看。但張雲翼等人發現逃入城內的日軍「方運卜馱於船所」，擔憂他們會乘夜逃遁。⁹¹ 但事實是他們並未逃走也無路可走，而是被堵死在了自己修建的倭城裡面。次日二十四日，麻貴申明號令，鼓勇諸將士連將伴鷗亭、太和江、城隍堂三寨打破，又斬首六百六十一顆，生擒倭將四名，「得獲倭馬、器具、盔甲、刀銃、旗幟無算，又燒毀寨內鋪面及住房萬餘間，倉糧牲畜盡數燒毀。倭見我兵勇戰，奔上島上山城（按：島山倭城），

85 此數據出自朝鮮陪臣張雲翼、權慄、李德馨的狀啟，收入《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條，頁 355。

86 （日）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東京：早稻田大學藏本町東都誠格堂嘉永刻本），卷之中，葉 7b-8a。

87 前引朝鮮陪臣張雲翼、權慄、李德馨的狀啟中稱五百餘級，萬曆時人徐希震和諸葛元聲皆言「四百四十餘級」，明·徐希震，《東征記》，葉 17a；明·諸葛元聲，《兩朝平壤錄·日本下》，頁 154。此處筆者更傾向於在當場的張雲翼等人。

88 明·徐希震，《東征記》，葉 17a。

89 可對勘（韓）李擢英，《征蠻錄》（首爾：韓國國學振興院藏數位掃描李擢英稿本），乾卷，頁 133；又見（韓）李擢英，《征蠻錄》（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河合文庫藏朝鮮王朝時代鈔本），坤冊卷 4〈事迹下〉，葉 13b-14a；（韓）李擢英，《孝思齋先生征蠻錄》（首爾：韓國國學振興院藏朝鮮時代刻本），天冊卷之 2〈事迹下〉，葉 11b。

90 明·諸葛元聲，〈日本下〉，《兩朝平壤錄》，頁 155。

91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條，頁 355。

堅守不出」。⁹²這兩天明鮮聯軍將士們奮勇爭先，「徑壓其壘，撲殺四十餘里，破滅堅城大柵數處，除焚溺死者不可勝計，計俘斬其將校（即日軍）已一千二百有奇。其素所蓄積，累歲所創置，一朝蕩然若掃」。連清正本人也「僅以身免」，殘眾逃島山，因為倭城陡堅，佯攻不便，「遂設長圍守之」。⁹³

據大河內秀元所記，和曆「廿三日」（明曆二十四日）卯時，「大明兩王」（蔚山日軍對楊鎬、麻貴的稱呼，也稱為「二人の王」）本陣小停片刻，早鐘一響，火矢（即火箭）、大筒等齊齊亂發，島山倭城裡天搖地動聲響如雷好像大地震，勢如明軍八十萬騎⁹⁴一時全來，天崩地裂。日軍人馬紛紛逃入倭城內第二、第三本丸。⁹⁵又據軍門通事朴義儉與楊鎬的「夜不收」偵察兵向朝鮮方面報告，這一仗明軍約斬日軍八百餘級，而「賊皆遁入土窟」，次日即二十五日，為了斷掉加藤清正求援的願望，高策、祖承訓領軍「遮遏西生浦應援之賊」，明軍派出使者持令旗及賞功旗、免死帖勸諭加藤清正投降可以免死，清正以不知道朝鮮允不允許他投降為理由狡辯，並拖延時機等待日方援軍救他，楊鎬、麻貴一看如此，繼續堅持對日軍圍城困死的戰略。⁹⁶

明朝朝鮮聯軍這一「累重圍抱攻打」的計策顯然是十分奏效的。十二月二十三日至翌年正月五日（和曆四日），蔚山日軍實際上已經被明軍圍困攻勢和物資匱乏、氣候苦寒打擊地甚深：按照大河內秀元的日記敘述，此時寒天難耐，大軍圍困，「食饑水渴」，⁹⁷物資上匱乏無比，糧食稀少，戰場附近飲用水短缺，水價暴漲，飲不到水的士兵只能飲用尿液，⁹⁸氣

92 明·諸葛元聲，〈日本下〉，《兩朝平攘錄》，頁 156；類似戰果又見明·徐希震，《東征記》，葉 17a。

93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4〈島山撤兵疏〉，頁 196-197。

94 大河內秀元的《物語》內多處將明軍記為八十萬騎，顯為誇張，不當取。但其作為少數留下的親歷者紀錄仍需重視。

95 （日）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卷之中，葉 17b-18a。

96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一月一日朔丁亥」條，頁 359。

97 （日）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卷之中，葉 31b。

98 同上註，葉 21b-22a。

候上天氣寒冽，士兵汗透甲冑立刻成冰，⁹⁹許多人都因此凍傷凍死。除去明軍、朝鮮軍所斬獲的侵略軍首級以外，凍渴餓餒病死的日軍也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據日軍出降者與縋城逃跑時被執者供述稱倭城裡守軍只剩「不滿三千」，被明軍「炮矢所殲」者並「饑渴死者」已經「橫屍成堆」、「僅鳥銃手二百名日食生米一合，餘皆奄奄待斃」。¹⁰⁰「城中無水，糧盡，人將枯死」。¹⁰¹日軍在城內龜縮，已經難以持續。加藤清正和淺野幸長寫信給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蜂須賀家政等人求救，聲稱有數十萬「大明人」把他們圍起來了，為自己士兵缺糧苦撐的狀態訴苦。¹⁰²大河內秀元也為了顯示日方被圍困得十分艱難，在日記裡把明軍說成八十萬人。這個數字到了其他日軍口裡變得更加浮誇，比如在侵朝日軍島津家部隊裡擔任文書記錄的修驗道僧侶面高連長坊就聲稱加藤清正正在蔚山和明軍數百萬人對峙。¹⁰³這些都是需要慎重甄別的。

翌年（1598）正月，加藤清正寫信求請的援軍陸續到達蔚山，局勢開始有變化。正月四日，¹⁰⁴明軍、朝鮮軍開始再次作大進攻，軍士攀城勇戰，但沒有獲得太大成效。據正月初四日李德悅狀啟，正月初三日「西生之賊，不知其數，從陸路來陣於賊城五里許西江越邊，李副總（如梅）、解總兵（生）等唐將及兵使等軍拒守江灘」。初四日「自曉頭」，明軍「無禦丸器械，肉薄攻城之際，賊放丸如雨，發無不中」，這樣看來，圍城之時日軍僅給鳥銃手供糧的目的就在於此。明軍中彈者「幾至五百，竟不得

99 （日）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卷之中，葉 20b。

100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4〈島山撤兵疏〉，頁 197。

101 1598 年農曆正月二十五日，給楊鎬擔任通事的朝鮮人白應駿自慶州來，將降倭向明軍反映城內無水無糧饑餓殆死的事情告知鄭慶雲，鄭慶雲將此寫入《孤臺日錄》，（韓）鄭慶雲，《孤臺日錄》（《壬辰倭亂史料叢書·歷史》第 10 冊），卷 3〈萬曆戊戌年正月〉，頁 251。

102 （日）參謀本部編纂，《日本戰史：朝鮮役》，第 210 號文書〈慶長三年正月一日加藤主計頭清正、淺野左京大夫長慶致築前中紙言秀秋、安藝宰相秀元、蜂須賀阿波守家政、竹中源介重利、早川主馬長政、熊谷內藏允直盛、垣見和泉一直、毛利民部大輔高政、福岡右馬允直高書狀〉，頁 221-222。這是加藤清正求救兵的一手文書之一，值得重視。

103 （日）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史籍集覽》第 25 冊），頁 653。

104 （日）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卷之下，葉 3b。

登城，辰時罷戰」。¹⁰⁵辰時罷戰這一點在太田一吉與加藤清正萬曆二十六年和曆正月四日（即農曆正月五日）致長束正家的信件裡也提到了，作為一手史料，可資確證也。¹⁰⁶日文史籍《清正記》聲稱此日雖然有明朝和朝鮮聯軍「百萬大軍」¹⁰⁷與清正對陣，但清正派出的一番隊仍然「討捕」聯軍二千三百七十級。¹⁰⁸擊敗百萬之眾固然屬於《清正記》的吹噓與誇炫，但對比朝鮮方面接伴使稱官兵犧牲了三千或四千的人數的紀錄，¹⁰⁹聯軍犧牲的二千三百七十人應該不是日軍過分虛報（但作為日軍取級「戰績」可能存在水分）。此後楊鎬、麻貴計劃撤軍回慶州。朝鮮接伴使則埋怨：「圍賊城十餘日，清正朝夕且降，或可就擒，而天將以軍兵多死，攻城無策，愴然意沮，不意舉軍撤回，人情驚解失望，無生之氣」，但也承認當時「賊船多數添泊，陸賊且逼。清正若一時糾合，反有追躡之計，則變且不測，尤為危懼罔極」。¹¹⁰總之，這一撤離是根據形勢變化所作的調整。

欲討論第一次蔚山之役的明軍犧牲與損失，必須回歸當事人的一手材料，這其中邢玠的《經略禦倭奏議》及張輔之《東師奏報失實疏》裡轉引督撫鎮臣題敘會疏等奏疏值得重視。萬曆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張輔之看到了征倭的督（邢玠）撫（楊鎬）鎮臣（麻貴）的題敘會疏，內稱「陣亡千把總官張應元等二十一員，軍兵青打哈等七百七十七名，陣傷回營身故官六員，病傷回營陸續身故軍兵張四等八百一十七名，輕傷官軍麻代等二千九百八員名」、「走傷陣死馬二千三百三匹，在陣彈傷倒死馬二百一十三匹」。¹¹¹此前張輔之接到了丁應泰的揭帖，應泰痛批蔚

105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一月十四日庚子」條，頁 365。

106 （日）參謀本部編纂，《日本戰史：朝鮮役》，第 211 號文書〈慶長三年正月四日太田飛驒守一吉、加藤主計頭清正、淺野左京大夫長慶致長束大藏大輔、德善院書狀〉，頁 223-224。

107 （日）古橋左衛門又玄，《清正記》（《史籍集覽》第 15 冊），頁 735-739。

108 同上註，頁 737。

109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壬寅」條，頁 365。

110 同上註，「宣祖三十一年一月十四日庚子」條，頁 365。

111 明·張輔之，《太僕奏議》（《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2〈東師奏報失實疏〉，頁 454-455。

山之役指揮層「委棄萬眾」、「馬死萬七千餘匹者」，簡直是「喪師釀亂，結黨欺君」，列楊鎬二十八罪、十可羞，歷數提督麻貴「奸巧不法」狀，列副將李如梅「六當斬」、「十當罪」，連內閣大臣張位、沈一貫都被狠狠地指責一番。丁應泰還附上了邢、楊、麻等人「漏報陣亡花名文冊一本，私通清正倭書二紙」。¹¹² 丁應泰在抗日援朝戰爭中立場偏向主和，政見與楊鎬等人完全歧異，雙方對此敘述必然差異巨大。誠如前人所揭櫫，丁應泰的上疏彈劾，本身屬於明朝內部黨爭的一部分，¹¹³ 應泰的厚誣是出於黨同伐異的私心，並非公論，更遑談事實。針對丁應泰對楊鎬、麻貴的彈劾指控，朝鮮君臣均感到不解與冤屈，宣祖在向萬曆帝呈上的奏本中說：

島山之役，楊鎬……一同提督（麻貴）及諸將勵氣督戰，焚燒內外寨柵，斬獲千餘級，清正窮感一穴，渴餒幾斃。是蓋曠世之奇功，而不幸天雨急寒，士卒多傷，我勢已疲，而賊援大集，固將有腹背受敵之患。楊鎬與麻貴密察事機，宣令左次，仍將遺下糧餉盡行焚燒，挑選馬軍，身自為殿，賊不敢追躡。即其事狀終始如此，令賊徒膽破，遇有小邦人扮作天兵貌樣則輒皆走避，不敢恣意樵採。是孰使之然哉？若征剿實績，則既有小邦跟隨陪臣，又有領兵諸將，目見具悉，其進退先後、人馬失亡、功罪查覈，自有公論。天日在上，豈容虛誑？臣於其時擬將經理、提督及諸將勞績，具本上聞，以謝天恩，楊鎬過執謙遜，力寢其奏。臣以是為欲，曾不料今日之論，紛紛至此。¹¹⁴

以往中日韓學界在還原這場戰爭的時候，對明朝一方指揮階層的親身說法

112 明·張輔之，《太僕奏議》（《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 2〈東師奏報失實疏〉，頁 454。

113 可參〈韓〉허지은（許芝銀），〈丁應泰의 「朝鮮誣告事件」을 통해 본 조·명관계〉，《사학연구》76(2004): 169-205；劉寶全，〈明晚期中國和朝鮮的相互認識：以丁應泰和李廷龜的辯論為中心〉，收入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 19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頁 48-60；孫衛國，〈丁應泰彈劾事件與明清史籍之建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2012.6): 74-86；解祥偉，「壬辰戰爭期間朝鮮對明辯證問題研究：以『丁應泰彈劾朝鮮』事件為中心」（廣州：暨南大學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14）。

114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七月甲申」條，頁 458。

重視不夠，比如張輔之的這篇奏疏幾乎很少有注意者，該疏引了邢、楊、麻的奏疏提供的蔚山之戰明軍詳細的人馬傷亡名單，屬於一手材料。儘管張輔之疏內是轉引的邢、楊、麻奏疏部分原文而非全璧，但仍應當加以重視。從張輔之轉引的疏文來看，明軍在人數上犧牲了千把總官張應元等 21 員將官，青打哈等 777 位軍兵，陣傷回營身故官 6 員，病傷回營陸續身故軍兵張四等 817 名，輕傷官軍麻代等 2908 員名，總共 1621 名將士犧牲，2908 名將士受傷；在馬匹上「走傷陣死馬」2303 匹，「在陣彈傷倒死馬」213 匹。¹¹⁵ 又按邢玠的敘述，在王京會勘時，麻貴帳下陣亡一千、棄米三萬，西路損軍一千三四百；¹¹⁶ 馬匹一項，由於「冰雪寒凍，山嶺崎嶇」，加之戰場中彈損傷，共計「走傷倒死者」2103「匹頭」，「在陣旬日彈傷倒死者」213 匹。¹¹⁷ 損失也是比較大的。

朝鮮方面的說法，按照李德馨的調查，「得先後陣亡官兵共該八百餘員名，被傷官兵共該三千餘員名，其後到安東路上，多見被傷官兵因傷物故，該數想過一千餘員名，官兵死傷之數，大約如此」，¹¹⁸ 李如梅的接伴使李德悅馳啟則說「當日諸軍撤還之際，水陸倭賊合兵追擊，至於三十里之外。唐軍死者無數，或云三千，或云四千」。¹¹⁹ 而日軍聲稱的明軍損失，按照大河內秀元記載，和曆「正月六日」（明曆七日）日軍清點這場「高麗義川河原合戰」戰績，「大將軍秀詮公」（即小早川秀秋）及其「御家老」獲明朝、朝鮮聯軍首級「都合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八」，日軍方面陣亡人數（「味方の内討死」）達到「二千八百餘也」。¹²⁰ 但這與當時明朝、朝鮮方的紀錄相差過於懸殊，按照大河內秀元屢有類似「八十萬騎」之筆法，這一數目還是存疑，很可能 13238 這個數字作了不小的誇大，而日軍陣亡

115 明·張輔之，《太僕奏議》，卷 2〈東師奏報失實疏〉，頁 454-455。

116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6〈題科部會勘未竟疏〉，頁 23。

117 同上註，卷 4〈買補東征馬匹疏〉，頁 311。

118 根據〈朝鮮國王為辨覈冤枉事咨欽差查勘東征軍務兵科左給事中〉內引前任經理楊同候陪臣李德馨狀啟，載《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乙卯」條，頁 540。

119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壬寅」條，頁 365。

120 （日）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卷之下，葉 7a-7b。

二千八百餘的數字有所縮小，實際日軍傷亡可能並不止這些。大河內等日方參戰者，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戰敗，加之日方亦擔憂敗戰受罰，因此這些參戰者的不管是文書還是戰記，都有意無意放大了明軍的損失，弱化自己的失敗事實。至於《明史》〈朝鮮傳〉裡「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皆潰。遂撤兵還王京，士卒物故者二萬」則幾乎要比部分日軍親歷者（如大河內秀元）的記載還要誇張了，更不可取。¹²¹

總而言之，針對這一問題，筆者更傾向於綜合比對朝鮮當時紀錄和邢玠等人的說法，加之審慎參考日文史籍，即得出戰場當陣傷亡加返軍途中、回營之後因傷去世的明軍官兵人數，總共大概在三四千人左右，由此觀之，第一次蔚山之戰雖然沒有將蔚山島山日軍一舉全殲，明軍、朝鮮軍也遭受了不小的將士犧牲、器械丟棄的損失，但這一籠城圍困的戰略極大打擊了日軍的信心，保衛了朝鮮國土。但這是用明軍、朝鮮軍將士的大量犧牲換來的，是用每一個百姓家子弟的犧牲去驅逐日軍，此誠不可忘之。

但由於楊鎬後來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並被明廷下獄論斬，其作為「罪臣」的形象亦板上釘釘，《明神宗實錄》對其策劃的蔚山之役，亦採用了應泰的奏疏，認為其喪師欺君，將《實錄》作為主要史源的清官修《明史》亦是繼承這一說法，稱「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恨」，¹²² 楊鎬與麻貴戮力指揮的蔚山之役被反功為罪，甚至認為整場援朝戰爭都是「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的大敗仗。¹²³ 這並不符合事實。

這屬於一場有些倉促的勝利，提前撤退固然有些局促、失策，但也是面對日方大量援軍趕來後不得不然的做法。這導致明朝朝鮮聯軍人馬物資遭受很大損失，但也不能因此否認日軍的大敗，因為從丁酉再亂明軍入援，到三路之戰（萬曆二十六年九月以後）開始之前，明朝與朝鮮聯軍總共斬獲的日軍數目，計「中路前後擒斬活倭二百五名額，東路擒斬倭級一百五名額，西路通共擒斬倭級四百七十八名額，水路通共擒斬倭級

121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20 〈朝鮮傳〉，頁 8297。

122 同上註，卷 259 〈楊鎬傳〉，頁 6686。

123 同上註，卷 320 〈朝鮮傳〉，頁 8299。

一千二百三十四名額，焚溺生倭及船只器械尤多」，¹²⁴ 這相當有力的證明了總體戰局上明朝朝鮮聯軍的戰略性勝利。孫衛國先生認為，蔚山之戰雖然有所遺憾，未能全滅敵軍，但不失為一場重大的勝利，這也獲得了明朝、朝鮮雙方的一致認可。¹²⁵ 此說誠是。

接任楊鎬擔任援朝經理的萬世德，曾在上疏中總結麻貴之功：從最開始稷山之戰「首挫賊鋒」，青山之追奔「斬獲頗平」，日軍知「局面已更，遂狼狽而歸」，「王京無恙，屬國保全」，貴功一也；在島山面對清正「兩戰皆捷，破三寨，斬千人，困之旬日」，清正「經歲不敢出」，「慶東一路安如泰山」，貴功二也；東路之戰親自「逼城對壘，身不解甲者逾五旬」，日軍內外不通，餉餽斷絕，後聞訊而宵遁，貴功三也，前後獲級一千七百五十餘，「血戰之功為獨久且多」。¹²⁶ 正如朝鮮戰後為麻貴所立頌德碑銘所云：「制夷勝算，固已運諸帷幄。而任左協征勦之責者，實麻公也。夫虜將之老黠難制者，莫甚於清正。而清正雄據蔚州，真勁對也。公之領偏裨圍蔚州也，不疾不遲，惟幾惟時。臨高守要，騎截奔逸，斷餉道而禁樵路。首馘之獻，絡繹於途。則賊在窟穴，如獸在圍。坐困閱月，潛遁遠迹，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¹²⁷ 除去頌德碑銘中常見的歌功程式，其點出麻貴與清正為勁敵、聯軍困蔚山日久而日軍退去（也與秀吉去世，侵略作罷等多方面原因有關）等事實，可以說是很準確的描述與評價了。

五、在朝後期的麻貴及其後裔東遷事實考——兼論朝鮮對援朝明將的記憶之蛻變

麻貴策劃並參與的最後一場大規模戰役，是萬曆二十六年九月開始的

124 明·黃俟卿，《恤援朝鮮倭患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2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512。黃氏此處亦轉引敘功疏。

125 孫衛國，〈中朝視野下兩個形象迥異的楊鎬〉，頁606-620。

126 《萬曆二十七年經理撫院萬世德大敘平倭功疏略》，載姜良棟，《東征錄》卷之上，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葉48a-49b。

127 （韓）裴龍吉，《琴易堂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第62冊），卷6〈天將麻公頌功德碑銘並序〉，頁122。

第二次蔚山之戰。此前，明朝與朝鮮聯軍兵分三路，東路主帥麻貴，率明軍 24000，朝鮮軍 5514；¹²⁸ 中路主帥董一元，¹²⁹ 率明軍 26800，朝鮮軍 2215；西路主帥劉綎，率明軍 21900，朝鮮軍 5928；水路主帥陳璘率明軍 19400，朝鮮軍 7328，共計十餘萬。¹³⁰ 水陸一共四路，其中東路負責攻打蔚山。

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麻貴先攻打了盤踞東萊城內溫井等處的日本侵略軍，¹³¹ 明軍擊殺日軍三十餘級，救出被擄朝鮮民眾一千餘人，¹³² 二十日大軍移兵蔚山的島山倭城之下，但加藤清正自第一次蔚山之戰被圍吃到教訓後，這次聚眾龜守，修柵更險於前次，倭城堅如磐石，大軍雖臨城下，一時無計可施。明朝朝鮮聯軍先燒其外柵，但日軍射彈如雨，「天兵被害不知其數」，¹³³ 二十二日夜日軍出來偷襲，有五名明軍士兵被殺害，一名被俘虜。¹³⁴ 這場戰爭裡麻貴將麾下將士「分投埋伏」，設計阻擋清正西援，清正夜出，埋伏的明軍沖殺進入日營，「砍殺倭兵數多」，抓獲日軍士兵界磨及和將領化叱大里小如文，又焚燒島山、後江、南集糧寨房千餘間，「各賊赤身溺水者難以數算」。¹³⁵ 最後雖然明軍日日挑戰，但倭城內日軍就是龜縮不出，最後不得已只好退兵。¹³⁶ 加藤清正在寫給島津義弘和島津忠恒的書狀中也說：

此面（刊本原注：蔚山）へも去廿一日（即農曆九月廿二日）二、人

128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甲子」條，頁 520。

129 中路原計劃令李如梅帶，後如梅因事調遼，中路統帥以董一元代之。參明·茅瑞徵，〈倭下〉，《萬曆三大征考》，收入北京大學朝鮮文化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編，頁 241。

130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甲子」條，頁 520。

131 （韓）趙慶男，《亂中雜錄》，葉 47a。

132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壬子」條，頁 513。

133 （韓）趙慶男，《亂中雜錄》，葉 47a。

134 據親歷者、麻貴接伴使李光庭的馳啟，參《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壬子」條，頁 513。

135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6〈獻俘疏〉，頁 211。

136 （韓）趙慶男，《亂中雜錄》，葉 47a。

數七八万罷出候、雖然、及數度討果候之故、城際二陣取候事不成、
廿町程引退、對陣候行と相見候¹³⁷

除了在明軍人數上只誇大了兩倍多不到三倍以外，加藤提到明軍數度臨城進攻未遂而還這一點還算符合事實。十一月十七日夜，清正實行了「焦土作戰」，放火燒毀日軍營地後遁走，¹³⁸ 麻貴聞清正已撤軍，引軍還占蔚山空城。¹³⁹ 麻貴率軍入西生浦，又追至釜山與日軍對敵，擒獲日軍善叟戒、見次郎兩名，二十二日麻貴與清正對陣，明軍俘虜日軍三名，清正坐船逃逸。¹⁴⁰ 在明朝、朝鮮聯軍的大舉進攻下日軍已是完全被動防守的窘態，加之日軍因豐臣秀吉病死而人心渙散、陸續遁回日本，朝鮮漸漸又恢復了和平。

萬曆二十七年（1599）春，麻貴旋師歸國，班師之前，除了例行的官方送別，私下裡朝鮮士大夫作歌感念相送者多矣，如洪瑋（1559-1624）在送別麻貴等人班師還朝時，恭維麻貴「微禹，吾其魚矣；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贊其「誠以老爺既以出萬死之力而救吾人於魚肉，則必不能惜一投之勞而棄吾東於禽獸。小邦之倚老爺，老爺之濟小邦，不但今日而止也。」並作歌相送曰「山高海深，公德益厚。東人相謂，公我父兄。」¹⁴¹ 麻貴見文甚為受用，對洪氏「迎入禮遇，大加獎詡」。¹⁴² 在麻貴班師途徑忠州時，李時發（1569-1626）則作歌贊歎麻貴「天下無雙，山西第一」，喻之為「宋門之鑰，漢將之飛」，稱頌其「拯己水火，是生死肉骨之恩；

137 〈加藤清正書狀〉（日期署慶長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島津家文書之二》第 969 號文書，收入（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4），頁 252-253。

138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6〈獻俘疏〉，頁 222。麻貴的接伴使李光庭也說：「本月十八日，島山之賊盡焚窟穴，無遺撤去。提督率軍入城，一邊追擊。」《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丙午條」條，頁 535。

139（韓）申欽，《象村稿》，卷 38〈天朝先後出兵來援志〉，頁 264。

140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卷 6〈獻俘疏〉，頁 222。

141（韓）洪瑋，《西潭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續》第 11 冊），卷 4〈上麻提督詩歌〉，頁 471-472。

142 同上註，附錄上〈年譜〉，頁 499。

復我邦家，有仰父仰子之樂」，表示了「我公歸止，四牡駢駢。公歸不復，我心西悲」之情。¹⁴³ 親歷者對麻貴的懷念還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宣祖去世，其子光海君繼位以後，得知麻貴再次被起用為遼東總兵，光海君以麻貴「有大功於我」，還遣人前往主動拜問。¹⁴⁴

麻貴雖然離開了朝鮮，但他仍以一種另外的方式與朝鮮接續前緣，即後世朝鮮王朝對麻貴東遷朝鮮子孫之優遇，以及對麻貴的紀念。但麻貴後裔東遷朝鮮之事，允為中朝關係史上一件公案。韓國吳一煥、韓忠熙、朴現圭三位先生均認為這支東遷後裔出自麻貴家族，在學界儼為成說。¹⁴⁵ 而這一點或可商榷，試為陳之。

據朝鮮麻貴後裔自己的說法，明清易代之際，麻貴孫麻舜裳移居朝鮮並繁衍為上谷麻氏，又稱陝川麻氏。舜裳字禹繡，號三江。¹⁴⁶ 按成海應《皇明遺民傳》所云：

麻舜裳，遵化總兵里光子，都督貴孫，世襲指揮同知。父死於深河之戰，舜裳被俘在虜中六年，逃入中國。丁卯督糧登州，遇風於廟島，三日抵豐川。同舟二十九人皆溺死，舜裳獨生。流寓湖南之光州以終。舜裳善治蠶綿，其訣多傳於湖。¹⁴⁷

尹行恁的記述要更為詳盡，在其《海東外史》中增益了舜裳與仁祖朝名臣金堉（1580-1658）交談諷喻等細節：

143（韓）李時發，《碧梧先生遺稿》（《韓國文集叢刊》第 74 冊），卷 6〈代忠州士民上麻提督歌謠〉，頁 481。

144《朝鮮光海君日記》第 26 冊（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光海君二年四月十七日壬辰」條，頁 605。

145（韓）吳一煥，《海路·移民·遺民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 136；（韓）韓忠熙，〈조선 후기 상곡마씨 가문연구〉，《조선사연구》19(2010): 27-48；（韓）朴現圭，〈右衛 麻氏 묘지석과 上谷 麻氏 족보 고찰〉，《中國人文科學》71(2019.4): 351-369。

146（韓）吳一煥，《海路·移民·遺民社會》，頁 136。

147（韓）成海應，《皇明遺民傳》七，《研經齋全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74 冊），卷 43，頁 430。

麻舜裳者。麻貴之孫也。……朝鮮之復，麻公為首功焉。貴子里光，嘗以遵化總兵戰死深河。有子曰舜裳，世襲指揮同知，深河之役被擄入胡中，六年而逃。天啟丁卯督餉於登州，遂漂海抵海西之豐川府。朝廷不敢用，舜裳亦不自銜，故淪落不復聞焉。嘗遇大臣金瑒，說南方養蠶事，蓋其意欲以諷養士如養蠶也。因不得志，死於湖水之南。當麻將軍之東來也，頽伏轅門之外，不敢仰視。今其孫之來也，不得霑祿，蓋其勢使然爾。¹⁴⁸

這一敘述頗具傳奇性，但存在很大漏洞，首先，根據麻氏家族的墓誌，麻貴生有五子四女，長成者四子三女，子即承詔、承訓、承宗、承宣，侄子承勳、承恩，均為承字輩，孫輩為山字頭輩（岺、岵、岩等），曾孫胤字輩（胤麟等）¹⁴⁹但麻里光、麻舜裳卻並不符合麻氏家族輩分；再者，深河之戰屬於薩爾滸之戰的一部分，屬於明軍出兵四路裡的東路，這一仗中並無遵化麻姓總兵陣亡，而麻氏家族犧牲於薩爾滸之戰的，是攻打北路的開原副總兵麻岩，¹⁵⁰為麻貴之孫，麻舜裳反饋的信息均不合於明朝公私載籍。

按較為晚出的《上谷麻氏世譜》來看，該譜在堅持本族傳說的基礎上在細節方面做了一定的修正，該譜去掉了麻里光，麻舜裳則被稱為麻貴曾孫、麻承恩之孫、麻岩之子。該譜被吳一煥、韓忠熙、朴現圭三位先生引為信史，朴氏雖然在引用麻貴碑文對照該譜發現差異，但他認為是明清易代之際的混亂導致的，麻貴子孫東渡時沒有攜帶家譜，「憑記憶回憶祖先，所以發生差錯」，並據此堅稱不能否認家譜的真實性。¹⁵¹但這本家譜並不是明清易代之際的敘述文本，而是一個根據《明史》〈麻貴傳〉修改

148（韓）尹行恁，《碩齋稿》（《韓國文集叢刊》第287冊），卷9〈海東外史〉，頁150。

149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明·鄧林喬，《明故誥封夫人沈氏墓誌銘》（朔州：右玉縣殺虎口博物館藏碑）。

150 明·韓原善，〈危遼不容再壞畫策宜圖萬全條議〉，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叢書集成續編》第24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20，頁663-664；又可對照《滿洲實錄》，參考祁美琴、強光美整理，《滿文《滿洲實錄》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213。

151（韓）朴現圭，〈右衛麻氏 묘지석과 上谷麻氏 족보 고찰〉：369。

過的晚出文本。下表將該譜所述家族世系、成員履歷等核心內容與《明史》兩相對照，便可知也。¹⁵²

表一 《明史》與韓國麻氏宗譜的紀錄對比

	《明史》〈麻貴傳〉	《上谷麻氏世譜》
麻氏家族世系	麻祿生麻錦、麻貴，麻錦生麻承勳，麻貴生承詔、承訓、承宣、承宗。	麻祿生麻錦、麻貴，麻錦生麻承勳，麻貴生承恩、承詔、承訓、承宣、承宗、承東。麻承恩生麻岩，岩生麻舜裳。
麻氏成員履歷	錦子承勳，遼東副總兵，都督僉事，南京後府僉書；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綏、大同總兵官。更歷諸鎮，以勇力聞。後起援遼東，屢退避，下獄當死。詔納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承詔，寧夏參將。從平哱拜有功。後為蒼頭所弑。承訓，薊鎮副總兵。承宣，洮、岷副總兵。承宗，遼東副總兵，天啟初戰死沙嶺。	錦子承勳，萬曆中遼東副總兵，都督府都督僉事，南京後府僉書；承恩，萬曆中都督府都督同知，宣府、延綏、大同等處諸鎮總兵官，以勇力聞於天下；承詔，萬曆中寧夏參將；承訓，萬曆末薊鎮副總兵……；承宣，洮岷副總兵……；承宗，萬曆末遼東副總兵，天啟初與清虜力戰沙嶺大捷殉節；庶子承東，奉化琴氏所生，居于江界鴨綠里。

由上可見，《上谷麻氏世譜》對麻氏家族世系與成員的履歷敘述，除了多了一位中國載籍全無紀錄的麻承東，並對承恩下獄等事加以刪除外，幾乎完全脫胎於《明史》。該譜很有可能是一部參考過《明史》〈麻貴傳〉回溯建構的文本。《明史》〈麻貴傳〉對麻氏家族世系的錯誤記載，《上谷麻氏世譜》全盤繼承：《明史》記載承宣為麻貴第三子，承宗乃第四子，

152 表一史料來源為《上谷麻氏世譜》，收入（韓）上谷麻氏大宗會編，《大宗會二十四年史》（陝川：蒼泉齋上谷麻氏大宗會刊本，2005），附錄，頁 699-917；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38 〈麻貴傳〉，頁 6201-6202。

而實際上按麻貴夫婦合葬墓誌來看，承宗是第三子，承宣才是第四子，¹⁵³《明史》記載麻祿有錦、貴二子，但實際上麻祿生了綸、錦、富、貴四子，承恩是麻富所生。¹⁵⁴對承恩的描寫，《明史》稱「以勇力聞」，該譜則稱「以勇力聞於天下」；對麻貴諸子侄的官銜也是完全照搬《明史》，十分簡略。麻舜裳倘若真的出身麻貴嫡裔，大概不會不清楚自己的親叔伯情況。而且起初舜裳自稱是麻貴孫、麻里光子，《上谷麻氏世譜》即便是將之修改為殉難總兵麻岩子，年齡和事蹟也對不上：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麻貴夫婦下葬的時候，麻岩尚未生育子女，¹⁵⁵同年麻岩便在薩爾滸之戰中捐軀疆場，¹⁵⁶麻舜裳又怎麼會是麻岩之子呢？

並且，麻舜裳及其後裔對麻貴的追述，甚至出現了「大司馬、大軍行兵部尚書、中軍都督府大都督兼雲谷宣大等處騎兵都督兼陝西省兵馬大元帥、燉煌伯兼都指揮、都總諸軍帥經理」這種小說家言式的結銜，麻貴父親麻祿也被描述為正德年間流亡安南的「回回國王」，嘉靖年間從安南遷往「雍州藍田府」，其後又移寓「山西大同府右衛縣漠陣村」，但「回回國流亡安南」、「藍田府」、「右衛縣」都不合明代史實。即便放下時間、地點與官職的柄鑿之處，麻祿的祖父麻政，早在正德年間就是大同右衛的世居鄉老，大同右衛清真寺（今右玉縣官廳街清真寺）便是他所創建，¹⁵⁷麻貴及其子嗣亦相當熱衷於清真寺的修繕，是較為虔誠的穆斯林。¹⁵⁸曾親身經歷麻貴援朝的朝鮮文臣申欽也記述麻貴是「回回人」，¹⁵⁹應該說麻貴

153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154 明·佚名，《大明特進榮祿大夫都督□□□□□松山麻公墓誌銘》。麻祿墓誌載祿四子，麻貴墓誌載祿三子。

155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156 明·韓原善，〈危遼不容再壞畫策宜圖萬全條議〉，收入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20，頁 663-664。

157 明·佚名，《乾隆十八年立右玉縣禮拜寺錄「唐天寶元年西安府清真寺敕建碑文」碑記》（朔州：右玉縣官廳街清真寺藏碑），該碑名稱為筆者暫擬。這些大同、右衛之清真寺碑刻，筆者亦擬另撰文敘述。

158 明·佚名，《崇禎元年重修大同右衛城禮拜寺碑記》（朔州：右玉縣官廳街清真寺藏碑）；明·佚名，《天啟二年重修禮拜寺碑記有銘》（大同：大同清真大寺藏碑）。

159（韓）申欽，《象村稿》，卷 39〈天朝詔使將臣先後去來姓名，記自壬辰至庚子〉，頁 285。

的宗教民族屬性是相當明確的。但現有記載中對麻舜裳的紀錄，並無任何其具有伊斯蘭教風俗的證據，「回回國王」的想像固然瑰麗，但顯然舜裳並不清楚中國穆斯林的歷史與習俗，甚至該家族的祭祀中，也出現了伊斯蘭教不宜的物品（伊斯蘭教本身反對祭祖），《上谷麻氏世譜》對「回回」的認知，很大一部分可能來自於申欽的簡略描述。再從麻舜裳自述出自總兵麻里光來看，舜裳本人可能也對麻貴家族的成員情況、世系源流所知甚少。至於晚出的《上谷麻氏世譜》，使用起來更要謹慎。麻貴的直系後人是否真的前往朝鮮，在沒有新的證據以前只能存疑。

拋去真偽問題不談，這支朝鮮後裔牽涉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朝鮮王朝對麻貴為代表的明軍將士的感懷。通過朝鮮官方對麻貴後裔的搜求，可以看出朝鮮強化感懷抗日援朝明軍將士的努力，這其中反映了朝鮮王朝對援軍明將的認識變化，蘊含著尊周思明的歷史記憶，折射出明亡以後朝鮮逐漸強化感恩「天將」的一個政治活動歷程。我們可以先從麻舜裳這一代來入手：舜裳來東日久，生涯淡寂，隱居田野，王廷不知不問。自舜裳去世後，後裔長期以來更是湮沒無聞，直至東去一百七十餘年後，才由正祖李祘下教書要求完成務必訪得的工作：

祇拜奉室，歷審敬奉閣藏萬曆前後事大文迹，周旋升降，感慨卹切。仍念麻都督，當龍蛇之役，提兵東出，其功烈之盛，與李寧遠相伯仲。……其孫舜裳，與馮、王諸人因難來投，又與故相文貞公金瑬，論南方養蠶事，其詳在於《文貞日記》。而於今百有五十年之間，都督後承，或云流落湖南，而未聞其的在何地。令京外訪問，必求其後承以聞。¹⁶⁰

可惜正祖也沒有訪得，所以其曾孫憲宗李旼仍然命令繼續搜求。¹⁶¹ 根據韓忠熙的研究，麻舜裳子蓬直，孫綿蠶，曾孫葉豐，玄孫世服、永服，來孫謙、純，在朝鮮皆無功名，未曾出仕，婚姻往來亦與所居當地階層相交，親家身分高則鄉居進士、縣監，較低則生員，¹⁶² 如此朝鮮官方無法知其所

160 《朝鮮正祖實錄》第 47 冊（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正祖二十四年五月十日辛卯」條，頁 273。

161 《朝鮮憲宗實錄》第 48 冊，「憲宗六年三月二十日庚戌」條，頁 473。

162 （韓）韓忠熙，〈조선후기 상곡마씨 가문연구〉: 27-48。

在亦在情理之中。直到麻純子夏帛於憲宗九年（1843）參加了朝鮮專為「皇朝人子孫」所設之忠良科並及第後，麻氏後裔政治景況才略有好轉。夏帛及第後得任行厚州都護府使，散官通政大夫；夏帛子斗元得授行郭山郡守，散官通政大夫；夏帛兄夏縶子綺元得授黃州鎮兵馬節制都尉；斗元子亨國特別恩授行副護軍的勳官，散官通政大夫。所授予的文散官，都是正三品堂上的通政大夫，雖然實權不大，但象徵意義明顯。不過，從夏帛子孫通婚的外家地位來看，仍然以生員為主，¹⁶³ 這說明可能朝鮮上谷麻氏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因為這些國王恩賜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並且朝鮮麻氏的遭遇的特殊性，在與李如松等人子孫在朝鮮的境遇相比時更加明顯，麻貴作為第二次援朝的主帥之一，相當於李如松在第一次援朝中的地位，且朝鮮官方都認定了二人子孫「來東」並優待，然對比而言差異巨大：例如英祖十六年（1740）年特授「寧遠伯後孫」李勉為僉知，這比麻夏帛見用要早一百餘年；¹⁶⁴ 英祖四十三年（1763）起用「李如梅後裔」李宗胤，早於麻夏帛八十年；¹⁶⁵ 正祖二十四年（1800）擢「李如松後裔」李熙章，早於麻夏帛四十三年。¹⁶⁶ 並且李氏後孫的官職還要比麻氏略高，如李宗胤，他在朝鮮官方的認定裡，還不是李如松的直系後裔而是李如梅的後裔，¹⁶⁷ 都得到了昌城府使的除授，夏帛最高不過厚州府使。總之，朝鮮麻氏長期以來與仕途隔絕，也沒有李如松子孫那樣的名義上的厚遇與照顧，甚至朝鮮政府長期以來尋不見他們，直到憲宗李奐下教書再次極力搜求方得之，這件事還成為憲宗平生功績之一，被寫進了他的行狀。¹⁶⁸

上谷麻氏在「專尚門地」的朝鮮，雖然有國王的特賜優待，卻仍然無法很好地融入於朝鮮人社會，遑論自如地出仕了。因此直到麻氏來朝鮮

163（韓）韓忠熙，〈조선후기 상곡마씨 가문연구〉: 38。

164 《朝鮮英祖實錄》第 42 冊（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英祖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壬戌」條，頁 652。

165 同上註，第 44 冊，「英祖四十三年七月六日丁酉」條，頁 259。

166 《朝鮮正祖實錄》第 47 冊，「正祖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壬辰」條，頁 255。

167 《朝鮮正祖實錄》第 47 冊，「正祖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癸未」條，頁 96。

168（韓）權敦仁，〈景陵志狀〉，收入《朝鮮憲宗實錄》第 48 冊，頁 541。

第七代麻夏帛方有科名，¹⁶⁹而這已經距麻舜裳東渡二百餘年了。這固然不能理解為東渡諸將後裔皆如此，麻氏子孫只是其中相對較為極端的案例，卻也能稍窺遺民在朝境遇之一斑。儘管朝鮮國王出於「朝家軫念之道」對包含麻貴子孫在內的明遺民後孫殫精竭慮地改善其生活狀況與政治地位，但在朝鮮朝閥閥森嚴的社會中作用甚微，¹⁷⁰他們仍然難以自然地齒序於朝鮮士大夫之列，同時與祖籍地的割裂不可避免地使他們漸漸生疏於先祖的語言乃至風習，使其變成了對朝鮮而言熟悉的陌生人、本邦的異邦人。

此外，有一個有關蔚山蒼表堂的問題需要廓清，此堂據傳是萬曆二十七年麻貴為祭奠朝鮮將士而建，且親作〈蒼表堂序〉。自稱麻貴後裔的陝川麻氏亦對此堂多有關注，但始終屬於一種小規模的地方祠祀。此堂於日本殖民朝鮮時期拆除，近年來蔚山地方政府做了重建，但誘發了學術及社會爭議，爭議者認為此序為偽，因此對蒼表堂亦生懷疑，並借此影射、忽視甚至否認麻貴及明軍在援朝戰爭中的重要作用。¹⁷¹從該序來源來看，其僅為陝川麻氏所提供，孤證難立，陝川麻氏本身是否是麻貴後裔已需要更多證據來證明，家族文獻亦是參考過《明史》等文獻建構的晚出文本，該序亦概莫能外，此為〈蒼表堂序〉可疑之外證。從〈蒼表堂序〉的正文來看內證，文句、文氣頗有不通之處，即便可以用武將少文來解釋，那麼麻貴在〈蒼表堂序〉中自稱在朝鮮結交了義兄朴鳳壽、張吾石及義侄金洽伊甫，作為高層武官，如此「人臣無外交」的越矩行為，顯然不合情理；而且，根據本文所考，萬曆二十七年春麻貴已返回明朝，此序落款「萬曆

169 《朝鮮憲宗實錄》第 48 冊，「憲宗九年四月十七日庚寅」條，載：「教曰：『麻提督之後孫始有科名，則在朝家軫念之道，豈與李提督家有異乎？新榜出身麻夏帛，宣傳官作窠除授。』」（頁 495）。

170 孫衛國在《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第 4 章〈明遺民與朝宗岩大統廟〉縷述條析了儘管朝鮮國王出於報恩感激、尊周思明而對明遺民東去子孫傾注心血地照顧，但是收效甚微，並被士林批評的史實。參氏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223-225。本文亦贊同此分析。

171 來自首爾大學、蔚山大學、明知大學、慶北大學、韓國海洋大學等多位學者在 2015 年針對蔚山地區王辰倭亂史（包含蒼表堂、蔚山義兵問題）編寫了《울산임란사 재조명（蔚山王亂史再照明）》（蔚山：울산충의사，2015）一書。此書後來也涉及到了出版爭議。

二十七年仲冬再丁日，都廳提督麻貴謹識」，¹⁷² 不僅時間抵牾，而且「都廳提督」一名不合明制，都廳乃宋人稱尚書省辦公之所，何曾設置明清才出現的武官提督？因此該序確實是陝川麻氏自造之物。但陝川麻氏自造序文，托名麻貴建造祠堂的這些行為與麻貴在抗日援朝中的功績、影響，二者之間並不構成邏輯鏈。換言之，部分論著借論證蒼表堂真偽來突出朝方功績、影射扭曲忽略麻貴與明軍戰功的邏輯，略顯扞格難通。這場學術爭議的背後，某種程度也隱含著韓國學界秉持朝鮮自主抗敵成功的政治正確，是基於當代韓國主流價值下對明軍將領記憶的又一次改造。

總之，對明軍將士的紀念，是與朝鮮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交叉在一起的，是在朝鮮尊周大義的前提下所進行的。通過天將祭祀、皇朝人子孫參與明皇奉祀等各種形式，朝鮮官方反復強化對東征將士群體的紀念，這也是為了貫徹其尊周思明的立場，是朝鮮王朝政治正確性的所在。¹⁷³ 一直到新的「名分大義」，即以否定傳統宗藩為基礎的朝鮮民族主義勃興之前，祭祀明朝皇帝乃至天兵將官是朝鮮王朝統治社會的正當性之一。朝鮮官方認定的「麻提督子孫」，也被加入了朝鮮王朝國家層面追念的進程：

又啓言：「丁酉之役，摧破島夷，卽天將麻提督之力也。偉功壯蹟，實不下於李提督平壤之捷。其後裔，因亂東渡，或有先輩記述，至入於《尊周彙編》，故自正廟時，屢加搜訪，未得其人。近聞有寓在嶺南者，分付道臣，卽速起送，因令軍門，付料收用，請入參於皇壇享禮之班。」……從之。¹⁷⁴

但到了近代，隨著朝鮮由「尊明」逐漸走向「奉清」，¹⁷⁵ 清朝與朝鮮命運

172 陝川麻氏托名麻貴，〈蒼表堂序〉，收入（韓）徐義澤，《창표당（蒼表堂）과 서생포왜성（西生浦外城）》（蔚山：울산군，2001），頁 64-65。

173 朝鮮對明朝皇帝以及明軍將士的紀念，請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頁 99-145、頁 188-197。

174 《朝鮮憲宗實錄》第 48 冊，「憲宗六年三月二十日庚戌」條，頁 473。

175 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頁 524。關於對明軍的記憶，雖在正祖前後時期重新喚起（比如作為朝鮮王朝「尊明」之標誌的《尊周彙編》即編撰完成於此時），但

逐漸捆綁得越來越深，兩國共同面對席捲而來的帝國主義殖民熱潮，逐漸也無暇心及旁務，對明軍的祭祀也從熱烈歸於落寞，不管是麻貴還是整個明軍群體也漸漸隨之被淡化，直到近代風雲換局，日本殖民者逐步掌控朝鮮的情況下，為了敦勵朝鮮民族的自強之氣，同時又不觸及日本當局的「逆鱗」，「明朝」成為「阻擋」解放朝鮮半島民族自主性的最重要的符號之一，包含麻貴在內的明軍東援事蹟，自然而然就被有意或無意地湮沒於民族主義的浪潮之中，抹去了對其積極一面的追思，且餘風遷延至今，在韓國學界部分學者中流播深遠，以麻貴為代表的明軍群體更是由事實上的功臣轉化為其認知中的「罪人」。¹⁷⁶

我們也可以看出，朝鮮王朝關於麻貴為代表的援朝明軍的記憶，大體經歷了這樣一個階段：壬辰戰爭後（樹立）——明清易代（遺忘）——正祖前後（重新喚起）——朝鮮王朝末期到近代（遺忘）。援朝明軍在韓國集體記憶中的形象的蛻變，從功臣變成罪人，可謂是「作為神話的歷史」的絕佳案例之一。某種程度上，這裡的「歷史」已經不是歷史本身或者說過去本身，而是在當下之人腦海中的神話化記憶。他們「從歷史中找出個別的一些特點、特性或模式，把它們當成歷史的本質」。進一步講，基於

作為「奉清」重要表現的「北學派」興起及其影響之擴張，也大體興起於這同一時期。

176 典型的便是韓國史學界存在的「明朝出兵是為了自身遼東安危」的論點，如（韓）崔孝軾，〈明의 王辰倭亂 參與 動機와 그 實際〉，《백산학보》53(1999): 245-281；以及強調「明軍軍紀不良對朝鮮的消極影響」、「朝鮮給明軍供糧帶來的民弊」、「明軍指揮給朝鮮作戰帶來了幹擾」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如（韓）劉九成，〈王亂時 明兵의 來援考：朝鮮의 被害를 中心으로〉，《사총》20(1976): 1-23；（韓）韓明基，〈임진왜란 시기 명군지휘부의 조선에 대한 요구와 간섭〉，《한국학연구》35(2015):477-523；（韓）韓明基，〈임진왜란 시기 明軍 逃亡兵 문제에 대한 一考〉，《한국학연구》44(2017): 453-484 等。尤其是明知大學的韓明基教授，是韓國學界研究萬曆朝鮮戰爭乃至「兩亂」（倭亂和胡亂）的代表性學者，在學界與大眾傳媒兩方面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韓先生在一系列關於王辰倭亂的文章中，專注於明軍中少部分不修操守的士兵，忽略明軍高層對這些不良者的處分，以偏概全，聲稱明軍群體軍紀混亂，且給朝鮮造成民疲民弊，據此忽視明軍的援朝作用，極力強調明軍援朝是出於自保，甚至認為明軍援朝給朝鮮帶來的嚴重損害比日軍還要惡劣。其民族主義史學的色彩過於濃厚，筆者認為並不客觀。

當前政治需要和主流價值而把過往歷史反復改造，可能也是人類各社會的常態。¹⁷⁷

六、餘 論

麻貴親身指揮參與過的萬曆朝鮮戰爭是一場牽動東亞的國際性戰爭，經此一戰東亞格局天翻地覆：朝鮮半島在物質上而言，其農業經濟因人口土地的雙重破壞而荒廢，國力奄奄一息，危機重重，但恢復獨立，保住了綿綿一線國祚。在精神上「再造之恩」這一意識形態深入到戰後朝鮮王朝的各個角落，明鮮關係如父子恩育的理念得以強化，¹⁷⁸並在明亡以後，成為朝鮮「尊周思明」的心理根源；日本損失大量兵士、軍資，豐臣政權根基瓦解殆盡，最終被未深度捲入侵朝戰爭、保存了一定實力的德川家康所取代，建立江戶幕府，¹⁷⁹德川氏意識到了強攻朝鮮之不可靠，對朝政策趨向和平，加上對西、葡勢力的警惕，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也漸漸走入內向性，最終開啟了鎖國時代，而且直到江戶幕府結束，日本亦一直未敢再次就侵朝之事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明朝則因這場舉天下之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 5822000 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 200 餘萬兩」的戰爭耗費了難以計數的人力、物力，¹⁸⁰神宗甚至被時論譏為「高麗皇帝」，¹⁸¹援朝之役的確損傷了明朝國力，亦使努爾哈赤坐大於遼東，最終誘發明亡清興。¹⁸²而且，這場戰爭直接證明了，明朝並非是宗藩封貢體系中形象單一化的厚往薄來之「天朝」，對於屬國被侵略，日本挑戰這一東亞天下秩

177 (美) 柯文 (Paul A. Cohen) 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233-234。

178 (韓) 桂勝範著，徐成譯，〈兩場戰爭：明清之交的朝鮮王朝國家正體性問題研究〉，《山大史學》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頁 241-258。

179 羅麗馨，《十九世紀前的日韓關係與相互認識》，頁 384。

180 明·王德完，〈稽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以濟時艱疏〉，收入明·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444，頁 4884。

181 《朝鮮宣祖實錄》第 23 冊，「宣祖三十二年二月丙子」條，頁 584。

182 陳尚勝，〈字小與國家利益：對於明朝就朝鮮壬辰倭亂所做反應的透視〉，《社會科學輯刊》2008.1(2008.1): 116-123。

序，明朝是會綜合考慮國家利益與道德義務，不惜代價施行扶弱鋤強、撫「恭順」滅「跳梁」的政策，是會切實維護這一儒家倫理為經、經濟與政治利益為緯的封貢體系的。

同時，這場戰爭成為深入朝鮮民族集體記憶的重要歷史事件，隨著時間推移，戰爭親歷者自身的記憶將逐漸衰退，以其他形式為載體（如史籍史料、文學創作、銘勒碑石、紀念儀式等等）所保存的記憶的重要性便日益增加。「被占領、損失和遺忘破壞掉的連續性事後不能重新建立，但可以借助記憶的媒介重新將其連接在一起」，¹⁸³ 這些已經流逝的事物便通過回憶由此激活，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參與元素，明軍群體被屢次提及，長此以往，遂逐漸深化了整個族群的集體記憶。「倭亂中產生的戰爭英雄形象以及各敵對國之間造成的相互印象，在各國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斷獲得重新的定位，進而以各種形式反映到文學創作中。……這些文學作品，必然直觀地包含了特定社會的文化觀、戰爭觀以及對於敵對國的認知等。進而言之，壬辰倭亂中形成的諸多類似因素在此後的東亞歷史進程中不斷地傳承和蔓延，至今留存於韓、日兩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記憶中。」¹⁸⁴ 但針對具體的不同對象，比如麻貴，卻不完全如此。我們以在李氏朝鮮王朝民間極為流行的、反映朝鮮民間普遍認知的話本小說——大體形成於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前後（約值正祖到憲宗）的各類異本《壬辰錄》為例，檢曾經最流行的四種版本《壬辰錄》，加簡本中沒有提及麻貴，第二次援朝主角也換成了李如松；東繁本中麻貴出場相對多一些，有渡鴨綠、入都城、攻蔚山、敬舜臣、驅行章（長）等五個主要情節，但總體不到全書篇幅的 15%；精繁本中麻貴誤作麻里，僅在卷上出現了兩三次，占全書篇幅 4% 不到；央繁本中麻貴僅約占全書篇幅 5% 上下。¹⁸⁵

183（德）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著，潘璐譯，《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357。

184（韓）崔官著，金錦善、魏大海譯，《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頁 1-3。筆者認為分析朝鮮的王辰倭亂主題的文學創作，對於了解其在特定社會的文化觀、其對這場戰爭的認知、印象與記憶是很有裨益的。

185 筆者所使用的四種《壬辰錄》為：加州伯克利分校藏簡本（簡稱「加簡本」）、東洋文庫藏繁本（簡稱「東繁本」）、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藏繁本（簡稱「精繁本」）、韓

從這一角度看，結合對其民間流行文本的分析，在朝鮮王朝社會中，對麻貴及麾下將士的記憶是逐漸消解的，認知是逐漸模糊的，儘管這與其功績絕不相稱。但恰恰形成對比的是，這一時期官方及文人士大夫大量修纂諸如《皇朝人本朝忠臣目錄》、《皇明遺民傳》等尊周思明典籍，欲重新喚起與強化關於東征將士（包括麻貴）之記憶與紀念，這可能也是由於官方一定程度意識到了朝鮮民間對此的記憶之推移遺忘，加之尊周大義的倫理主義政治需求，故作出的反應。

麻貴的形象在戰後的朝鮮半島逐漸歸於落寞，與常被提起的李如松等人相比不能及之。這固然與如松第一次來援有「先入為主」的第一印象有關，通常情況下第一次經歷的往往會留下比第二次更深的記憶。這類似於社會心理學上的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即日常所說的「第一印象」，它是社會知覺中初次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印象對雙方以後交往關係的影響。¹⁸⁶ 作為第一次來援的元戎首帥，李如松最後變成了代表明軍的一個符號。加之李如松家族祖上是自朝鮮半島內附遼東的女真民族，¹⁸⁷ 李如松本人也曾自稱「吾是爾國人也，五代祖因有罪逃入中國，來時所持弓子至今猶存。」且「自稱獨魯江人，所謂獨魯江即江界地也」，¹⁸⁸ 無形中就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與朝鮮人的心理距離。朝鮮王朝官方在戰後對戰爭文化記憶的回溯與建構的過程中，選擇一個與自身王朝更有親緣感的來援將領作為典型，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這也就是同樣作為被朝鮮官方認定的援朝將領東渡子孫，對比李氏子孫，麻氏沉寂數朝而不為所知的深層原因。而

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繁本（簡稱「央繁本」），均為韓國漢文小說集成編委會編《王辰錄：萬曆朝鮮半島的抗日傳奇》中所收錄，其中加簡本為陳慶浩校點，東繁本為池潔校點，精繁本為趙維國校點，央繁本為孫遜及王乙伽校點。參韓國漢文小說集成編委會，《王辰錄：萬曆朝鮮半島的抗日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86 中文概念見費穗宇、張潘仕，《社會心理學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頁217。具體分析案例可見（美）戴維·邁爾斯（David G. Myers）著，侯玉波等譯，《社會心理學（第11版）》（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第3編第11章〈社會關係〉，頁400-401。

187 清·李樹德，〈鐵嶺李氏譜系序〉，收入何曉芳、張德玉主編，《清代滿族家譜選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頁961。

188 《朝鮮宣祖實錄》第21冊，「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十日丙寅」條，頁660。

近代朝鮮半島民族主義勃興以後，對明軍群體都已否定，麻貴本人作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被遺忘是在所必然。至於中國的麻氏子孫，由於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對於萬曆抗日援朝一事整體持否定態度，麻貴之子麻承宗、孫麻岩都曾在遼東與後金對峙，並犧牲於戰陣。隨著麻氏在遼東征戰的宿敵——清朝定鼎中原，原本煊赫的祖勳反倒成為了在新朝生存的「不良紀錄」，衛所的裁撤罷改與衛所制度的逐漸解體也使麻氏這類九邊將門失去了賴以維存的根本土壤，其抗日援朝之功績亦逐漸泯滅。¹⁸⁹ 最終造成了不管是在戰爭發生地的朝鮮王朝，還是麻貴子孫生存的故土，都逐漸遺忘其援朝的本末，只剩零碎殘片存留於歷史中。

對麻貴乃至明軍將士的忽視與遺忘，固然與時間的推移、戰後相關國家各自特殊的國情有關，但原始史料本身的難度給探究戰爭真相與影響也產生阻力：中、朝、日三國原始史料紛繁複雜，不管是細節還是宏觀上都互有歧異，這一差異來源於親歷者個人體驗、立場等主觀性因素及複雜外力等客觀性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了互見參差的敘述文本，後世在根據這些材料對事件進行重新還原建構的時候，在受其影響的同時又不可避免羈入了己見。在不同年代，試圖對事實之描述，與個人看法兩者虛實交互、層加疊，最終使如今看到的史料與研究，呈現了眾多令人難辨真偽的樣相。這種原始材料的差別引導著三國學界對同一場戰爭言人人殊，各自偏重本國史料，甚至出現「盲人摸象，祇知一斑」的情況。日本學界「國際戰爭意識仍較為淡薄，較少關注明朝軍隊的參戰實況以及明朝對戰爭結局所起的重要作用」，且漠視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表現出「去道德化」的

189 有關援朝明軍形象在歷史記憶中的蛻變，韓國方面則從褒而貶，中國方面其實也有類似現象，比如清朝官方長期的貶抑與淡化，萬斯年《明史稿》、王鴻緒《明史稿》，都有麻貴的單獨傳記，但是到了清朝欽定的殿本《明史》，麻貴就與李成梁合傳，雖然份量減輕，視石星、宋應昌、邢玠從本來在萬本、王本各有單獨傳記到殿本《明史》無傳，已屬幸運。總之，這是因為「援朝將士後來在遼東成為後金的對手，為了塑造清朝的正統性，必須對他們採取否定態度」，所以其在修《明史》時主要指揮階層和統帥將領的傳記都被或刪或減，孫衛國，〈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朝鮮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2018.5(2018.10): 26；陳尚勝，〈萬曆援朝戰爭關鍵性人物與《明史》相關人物立傳問題〉，《社會科學》51.4(2012.12): 40-48。

學術傾向；韓國學界則「民族主義色彩較為濃重」、「強調朝鮮在壬辰戰爭中的主要角色，對明朝軍隊參戰所起作用極為低估」，刻意輕視明朝史料，表現出「去中國化」的學術傾向；中國學界「仍缺乏東北亞地區國際關係史的視野」，略顯「自話自語」的學術傾向。¹⁹⁰ 綜合地探索中、日、韓三國參與者眼裡的戰爭體驗，從不同側面嘗試去回溯，才能相對立體地理解這場戰爭的多個面相，慢慢走近可能遙遠的真實（但因為歷史的不可逆性，只能接近，絕難復原）。

目前中文學界對萬曆朝鮮之役的研究有成果亦有缺憾，對於其他國家的研究狀況也大多缺乏了解和對話。中國學者對明軍將士研究的相對漠視，顯然令日韓學者占據了所謂上風，他們將其成果大量譯介為英語，導致西方有關學界在研究這場戰爭時，對明軍的看法多來自於這些日韓學者的刻板印象，典型例子就是加拿大學者塞繆爾·霍利（Samuel Hawley）的《壬辰戰爭》（*The Imjin War: Japan's Sixteenth-Century Invasion of Korea and Attempt to Conquer China*），¹⁹¹ 對明軍的看法既單薄又負面。本文所冀望的是，能從這些聚訟紛紜的蕪雜爭議中跳出，以核心人物事件為線索，涵泳於汗牛充棟的多元化史料中摒偽取真，從宏觀的跨國史視角出發，結合微觀的實證分析，努力釐清事件本身的實際脈絡，加深對這場東亞大戰爭性質的理解，也借此觀照那些歷史上重要卻被忽視的角落與碎片，雖然

190 陳尚勝、趙彥民、孫成旭、石少穎，〈地區性歷史與國別性認識——日本、韓國、中國有關壬辰戰爭史研究述評〉，《海交史研究》2019.4(2019.12): 96-124。

191 塞繆爾·霍利在《壬辰戰爭》中對明軍將士的評價極為負面，他認為：「明朝士兵……參軍的主要目的是獲得食物、金錢和搜刮戰利品的機會，……有時對友軍的威脅甚至比對敵人還大」（頁 227-228），並認為明朝出兵只是出於保護自己的安全之目的，對朝鮮半島的損害比日本侵略軍還要惡劣：「雖然明朝尊重東邊忠心耿耿的屬國，它的存亡卻不是明朝最為關心的。明朝首要的目標是保護自己的邊界……在接下來的戰爭中，朝鮮人從中國人那裡得到的軍事援助必定比他們請求的要少，而由此帶來的麻煩比預想的更多」（頁 228），參（加）塞繆爾·霍利（Samuel Hawley）著，方宇譯，《壬辰戰爭》（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孫衛國已經發表書評指出霍利的觀點是受日韓學者影響，忽視中國史料，缺乏論證論據，見氏著，〈西方人眼中的壬辰戰爭：評塞繆爾·霍利《壬辰戰爭》〉，《「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頁 317-326。

目前仍處於一種粗淺的嘗試。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明·于慎行，《穀城山館詩集》，《明別集叢刊》第4輯第4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

明·王鳴鶴，《登壇必究》，《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第3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影印明萬曆刻本。

明·佚名，《大明特進榮祿大夫都督□□□□□□松山麻公墓誌銘》，朔州：右玉縣殺虎口博物館藏碑。

明·佚名，《崇禎元年重修大同右衛城禮拜寺碑記》，朔州：右玉縣官廳街清真寺藏碑。

明·佚名，《天啟二年重修禮拜寺碑記有銘》，大同：大同清真大寺藏碑。

明·佚名，《乾隆十八年立右玉縣禮拜寺錄「唐天寶元年西安府清真寺敕建碑文」碑記》，朔州：右玉縣官廳街清真寺藏碑。

明·邢玠，《經略禦倭奏議》，《禦倭史料匯編》4-5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影印明後期刻本。

明·苕上愚公（茅瑞徵），《東夷考略》，臺北：正中書局，1981，頁174-175。

明·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收入北京大學朝鮮文化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明·孫鑛著，孫如洵輯，孫元杏、孫光烈校，《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嘉慶靜遠軒重刻本。

明·徐希震，《東征記》，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萬曆三十二年（1604）刻本。

明·張輔之，《太僕奏議》，《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影印明天啟間刻本。

明·梅國楨，《西征集》，東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刻本。

明·陳子龍等編，《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影印明崇禎間刻本。

-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叢書集成續編》第 24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明·黃侯卿，《恤援朝鮮倭患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5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 明·楊鎬，《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朔州：右玉縣殺虎口博物館藏碑。
- 明·趙南星，《趙忠毅公詩文集》，《明別集叢刊》第 4 輯第 28 冊，合肥：黃山書社影印，2015，影印明崇禎刻本。
- 明·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收入北京大學朝鮮文化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壬辰之役史料匯輯》下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影印明萬曆刻本。
- 明·鄧林喬，《明故誥封夫人沈氏墓誌銘》，朔州：右玉縣殺虎口博物館藏碑。
-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萬曆二十七年經理撫院萬世德大敘平倭功疏略》，收入姜良棟，《東征錄》卷之上，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葉 48a-49b。
- 《朝鮮宣祖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 《朝鮮光海君日記》，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 《朝鮮英祖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 《朝鮮正祖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 《朝鮮憲宗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 《上谷麻氏世譜》，收入（韓）上谷麻氏大宗會編，《大宗會二十四年史》，陝川：蒼泉齋上谷麻氏大宗會刊本，2005。
- （韓）尹行恁，《碩齋稿》，《韓國文集叢刊》第 287 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
- （韓）申欽，《象村稿》，《韓國文集叢刊》第 72 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
- （韓）成海應，《研經齋全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74 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
- （韓）李擢英，《征蠻錄》，首爾：韓國國學振興院藏數位掃描李擢英稿本。
- （韓）李擢英，《征蠻錄》，京都：京都大學圖書館河合文庫藏朝鮮王朝時代鈔本。
- （韓）李擢英，《孝思齋先生征蠻錄》，首爾：韓國國學振興院藏朝鮮時代刻本。
- （韓）李時發，《碧梧先生遺稿》，《韓國文集叢刊》第 74 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

- (韓) 吳希文,《瑣尾錄》,《壬辰倭亂史料叢書·歷史》第 6 冊,晉州:國立晉州博物館,2002。
- (韓) 洪直弼,《梅山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95 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
- (韓) 洪瑋,《西潭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續》第 11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10。
- (韓) 姜浚欽,《三溟詩集》,《韓國文集叢刊續》第 110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10。
- (韓) 黃景源,《江漢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24 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
- (韓) 裴龍吉,《琴易堂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62 冊,漢城:景仁文化社,1996。
- (韓) 趙慶男,《亂中雜錄》,《大東野乘》第 28 卷,漢城:朝鮮古書刊行會,1910。
- (韓) 鄭慶雲,《孤臺日錄》,《壬辰倭亂史料叢書·歷史》第 10 冊,晉州:國立晉州博物館,2002。
- (日) 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東京:早稻田大學藏本町東都誠格堂嘉永刻本。
- (日) 古橋左衛門又玄,《清正記》,《史籍集覽》第 15 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
- (日) 貝原益軒,《黑田家譜》,福岡:福岡縣立圖書館竹田文庫藏江戸時代寫本。
- (日) 貝原好古,《菅氏世譜》,《史籍集覽》第 15 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
- (日) 林羅山,《豐臣秀吉譜》,名古屋:愛知縣圖書館藏日本明曆四年(1658)刻本。
- (日)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4。
- (日) 面高連長坊,《面高連長坊高麗日記》,《史籍集覽》第 25 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2。
- (日) 參謀本部編纂,《日本戰史:朝鮮役》,東京:偕行社,1924。
- 石雲里,《海外珍稀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集成》,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0。
- 何曉芳、張德玉主編,《清代滿族家譜選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
- 祁美琴、強光美整理,《滿文《滿洲實錄》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二、近人論著

- (日) 中野等 2008 《文祿・慶長の役》,東京:吉川弘文館。
- 牛建山 2015 《殺虎口旅遊區博物館碑廊碑文辨析》,《右玉文史資料》第 23 輯,朔州:右玉縣政協辦公室文史資料委員會,頁 16-67。
- 白壽彝 1988 《回族人物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日) 北島萬次 1995 《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東京：吉川弘文館。
- (韓) 朴現圭 2019 〈右衛 麻氏 묘지석과 上谷 麻氏 족보 고찰〉，《中國人文科學》71(2019.4): 351-369。
- (韓) 吳一煥 2007 《海路·移民·遺民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李光濤 1972 《朝鮮壬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韓) 李炯錫 1974 《壬辰戰亂史》，漢城：新現實社。
- (韓) 李啟煌 1997 《文祿·慶長の役と東アジア》，京都：臨川書店。
- (德) 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著，潘璐譯 2015 《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美) 柯文 (Paul A. Cohen) 著，杜繼東譯 2015 《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日) 津野倫明 2011 〈黒田長政宛鼻請取狀について〉，《高知大學人文學部人間文化學科・人文科學研究》2011.17(2011.7): 1-21。
- (韓) 洪性鳩 2017 〈丁酉再亂時期明朝的糧餉海運〉，《新亞學報》34(2017.8): 259-284。
- 紀海龍 2020 〈麻貴軍旅行實考析〉，《回族研究》2020.2(2020.6): 47-52。
- 孫衛國 2007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衛國 2011 〈中朝視野下兩個形象迥異的楊鎬〉，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古代社會高層論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606-620。
- 孫衛國 2012 〈丁應泰彈劾事件與明清史籍之建構〉，《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2012.6): 74-86。
- 孫衛國 2018a 《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孫衛國 2018b 〈清官修《明史》對萬曆朝鮮之役的歷史書寫〉，《歷史研究》2018.5(2018.10): 21-37。
- 孫衛國 2021 《「再造藩邦」之師：萬曆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韓) 徐仁漢 1987 《壬辰倭亂史》，漢城：韓國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
- (韓) 徐義澤 2001 《창표당 (蒼表堂) 과 서생포왜성 (西生浦外城)》，蔚山：울

산군。

- (韓) 桂勝範著, 徐成譯 2020 〈兩場戰爭: 明清之交的朝鮮王朝國家正體性問題研究〉, 《山大史學》第 1 輯,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頁 241-258。
- (韓) 崔孝軾 1999 〈명의 壬辰倭亂 參與 動機와 그 實際〉, 《백산학보》 53(1999): 245-281。
- (韓) 崔官著, 金錦善、魏大海譯 2013 《壬辰倭亂: 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韓) 허지은 (許芝銀) 2004 〈丁應泰의 「朝鮮誣告事件」을 통해 본 조·명관계〉, 《사학연구》 76(2004): 169-205。
- (加) 許南麟 (Nam-lin Hur) 著, 宋宇航譯 2017 〈丁酉再亂時期豐臣秀吉的撤退嘗試與戰爭的終結〉, 《新亞學報》 34(2017.8): 285-314。
- 陳尙勝 2008 〈字小與國家利益: 對於明朝就朝鮮壬辰倭亂所做反應的透視〉, 《社會科學輯刊》 2008.1(2008.1): 116-123。
- 陳尙勝 2012a 〈壬辰禦倭戰爭初期糧草問題初探〉, 《社會科學輯刊》 2012.4(2012.8): 174-182。
- 陳尙勝 2012b 〈萬曆援朝戰爭關鍵性人物與《明史》相關人物立傳問題〉, 《사회과학교육》 51.4(2012.12): 40-48。
- 陳尙勝 2017 〈論丁酉戰爭爆發後的明軍戰略與南原之戰〉, 《安徽史學》 2017.6 (2017.12): 26-37。
- 陳尙勝、趙彥民、孫成旭、石少穎 2019 〈地區性歷史與國別性認識——日本、韓國、中國有關壬辰戰爭史研究述評〉, 《海交史研究》 2019.4(2019.12): 96-124。
- 費穗宇、張潘仕 1998 《社會心理學辭典》, 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加) 塞繆爾·霍利 (Samuel Hawley) 著, 方宇譯 2019 《壬辰戰爭》, 北京: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 楊海英 2014 《域外長城——萬曆援朝抗倭義烏兵考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海英 2020 〈明代萬曆援朝戰爭及後續的海運和海路〉, 《歷史檔案》 2020.1(2020.2): 52-61。
- 楊海英 2022 《從《唐將書帖》看明清時代的南兵北將》,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解祥偉 2014 「壬辰戰爭期間朝鮮對明辯誣問題研究: 以『丁應泰彈劾朝鮮』事

件為中心」，廣州：暨南大學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

劉寶全 2005 《壬辰倭亂時期朝明關係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劉寶全 2011 〈明晚期中國和朝鮮的相互認識：以丁應泰和李廷龜的辯論為中心〉，收入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 19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48-60。

劉子敏、苗威 2006 《明代抗倭援朝戰爭》，香港：亞洲出版社。

(韓) 劉九成 1976 〈壬亂時 明兵의 來援考: 朝鮮의 被害를 中心으로〉, 《사총》 20(1976): 1-23。

(韓) 울산 충의사 (蔚山忠義祠) 編 2015 《울산임란사 재조명 (蔚山壬亂史再照明)》，蔚山：울산충의사。

(美) 戴維·邁爾斯 (David G. Myers) 著，侯玉波等譯 2016 《社會心理學 第十一版》，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韓) 韓忠熙 2010 〈조선후기 상곡마씨 가문연구〉, 《조선사연구》 19(2010): 27-48。

(韓) 韓明基 2015 〈임진왜란 시기 명군지휘부의 조선에 대한 요구와 간섭〉, 《한국학연구》 35(2015): 477-523。

(韓) 韓明基 2017 〈임진왜란 시기 明軍 逃亡兵 문제에 대한 一考〉, 《한국학연구》 44(2017): 453-484。

韓國漢文小說集成編委會 2016 《壬辰錄：萬曆朝鮮半島的抗日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麗馨 2020 《十九世紀前的日韓關係與相互認識》，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

Swope, Kenneth M.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 1592-1598*.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9.

The Forgotten Hero: Reassessing the Military Contributions of Ma Gui in the Imjin War

Xu Cheng*

Abstract

Ma Gui 麻貴 (1538-1616) was one of the highest-ranking generals of the Ming dynasty involved in the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of 1592-1598 (the Imjin War), and concerning his contributions as a whole, numerous historical works,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Ming* 明史, hold a negative attitude. But by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a, Korea, and Japan, we can see through the erroneous facts and discover that these accounts are far from the truth: Ma Gui, for example, participated in the planning and directing of a series of campaigns, including the Battle of Jiksan and the two sieges of Ulsan, thereby greatly contributing to victory in the war. Because of his efforts in the defense of Korea and the return of largely peacefu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the Joseon dynasty ga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his so-called descendants who had “moved East” out of gratitude. However, this feeling of appreciation gradually died out due to various complicated factors, and the contexts and contributions of Ma Gui’s military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aid to the Korean government were also forgotten over time. More specifically,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is that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modern era led to the deliberate discounting of Ming forces. Moreover, the present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resent several difficult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exemplified by how historical acto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personal factors chose to construct dissimilar discursive narratives.

Keywords: Ma Gui 麻貴, the Imjin War, the Battle of Jiksan, sieges of Ulsan, transnational history

* Xu Cheng, PhD candidate,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